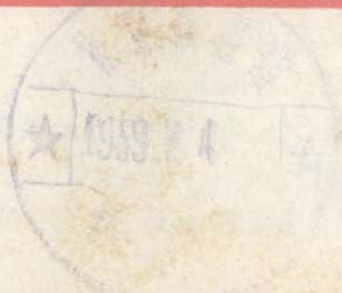


# 理论与实践

LILUN YU SHIJIAN

30.3 1-62

30.3



1

1959

# 目 录

論两个过渡 .....	严克柔 ( 1 )
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 .....	陈迅之 ( 5 )
关于人民公社当前的分配制度 .....	孙 孺 ( 8 )
論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 .....	陈文川 ( 12 )
論工业战綫的群众运动 .....	杨 繁 ( 15 )
青年学生参加学术思想批判的意义 .....	王威宜 ( 19 )
我們怎样做工人学哲学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	曹平凡 ( 22 )
評“美是什么？” .....	溫 莎 ( 25 )
个别与一般的辯証关系 .....	燕 丘 ( 27 )
批判罗克汀的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哲学 .....	章良潮 ( 33 )
广州学术界座談资产阶級法权問題綜述 .....	本刊編輯部 ( 37 )
正确对待破除资产阶級法权残余問題 .....	李超桓 ( 39 )
对破除资产阶級法权残余問題的一点意見 .....	龙世雄 ( 41 )
资产阶級法权残余的主要表现 .....	魏双凤 ( 41 )
实行按劳分配符合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律 .....	譚超白 ( 42 )
对资产阶級法权残余的看法 .....	黃家駒 ( 42 )
一点补充修正 .....	何 城 ( 44 )
——关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級法权残余問題	
猫和花 .....	秦 牧 ( 45 )
宇宙火箭与紙老虎 .....	于燕郊 ( 46 )
对资产阶級知識分子进一言 (讀者中来) .....	合 群 ( 48 )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资产阶級式的法权”(資料) .....	( 50 )

动

广州市南区成立工人哲学研究会

广州市举办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会

广州市訂出1959年理論宣传工作规划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派出工作組进行人民公社調查研究工作

“广东历史資料”創刊号出版

中山大学文科各系教学改革正在深入

态



# 論兩個過渡

严克柔

—

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带有战略性变革的两个历史过程，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带有根本性的两个理論問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异常明确地給全国人民提出了两个过渡（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面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和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的两个战斗任务，誰要是忽視了这个伟大的变革，忽視了这两个战斗任务，那是极端錯誤的，但是，认为人民公社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或者认为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共产主义，这当然也是不对的。对于这两个問題，六中全会的決議做出了創造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論貢獻，我們必須好好認真学习。

有人認為：人民公社这种形式里面，存在着全民所有制的因素，而且很快就变成全民所有制了，要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分清楚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又有人認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級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量的区别沒有质的区别，因而也很难和沒有必要划分两个阶段。他們不明白：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斷革命論者，同时又是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澤东同志从来是主张革命分阶段的，沒有阶段之分就无所谓不断革命。毛澤东同志曾把革命的前后阶段比喻为互相关联的两篇文章，他說：“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我国革命的历史証明：整个的革命过程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一环扣一环的，而且大阶段中又有若干小阶段，大环中又有若干小环。我們党和毛澤东同志总是把每一个阶段的质規定得清清楚楚，并根据这个质的規定制訂这个阶段的战略和策略，方針和政策，这样，便会使我們既能防“左”，又能防右，既不犯保守主义的錯誤，又不犯冒险主义的錯誤。因此，我們一定要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质的界綫划分清楚，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质的界綫划分清楚，不能混淆，否則我們就不能避免“左”的或右的錯誤。

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它要变成全民所有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時間（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更长一段時間），在这一段時間內，必須明确地規定它的质，即集体所有制，这是我們制訂一切方針政策的出发点，明确了这个出发点，又明确了下一阶段的目标，我們就有可能迅速而穩妥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是第一条界綫。还有第二条界綫，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划分开来，我們还要經過相当长的時間（例如十五年、二十年或更长一点的時間），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在这段时间內，一切的方針政策，都是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两个“过渡”之所以同时提出，乃是因为这是互相关联而又互相区别的两个过程。我們既是不斷革命論者同时又是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我們要使革命不断前进和不断胜利，就要善于在一个阶段中既繼續解之所以同时是遺留問題，又要为后一阶段准备好条件。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

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比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时间要长得多，因此这两个过程必须区别清楚。但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正是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也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必要的基础。只有前一个“过渡”，而没有后一个“过渡”，既不利于不断革命，又会影响前一个“过渡”。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者之间有着共同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它的对立面是私有制），但这两种所有制是有区别的。全民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属于全民所有的，集体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和产品只属于部分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包括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的产品，而且是生活资料的产品）也为全民所有。它的集中表现是可以由国家调拨，调拨包括三方面，一是产品，一是积累，一是劳动力。在目前阶段，我们的国营企业是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它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全民所有的，它的产品、积累以至劳动力在必要时可以实行全国调拨。目前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基本上仍然属于集体所有制，它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基本上是为部分人民所有的，产品、积累、劳动力一般是不能实行全国调拨的。

集体所有制有它的发展过程，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面对的是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商品生产经济，其中更多的是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是分散的和落后的，它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经济必须改变，但是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不能一下子改变成为象国营经济一样的全民所有制，而只能把这种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逐步地组织起来，由带有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初级合作社），再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高级合作社），这是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唯一可能和适当的道路。现在，高级合作社又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发展成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高级合作社的扩大，是包括工农商学兵的一个社会组织，它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它比高级社有更大的优越性，但是人民公社基本上仍是集体所有制，是由小集体所有制发展到大集体所有制。不过它又不是“纯粹”的集体所有制，这种集体所有制已经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成份。这是由于公社和基层政权的合一；由于农村中原有的全民所有制的银行、商店和某些其他企业下放到公社管理；由于公社参加兴办某些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工业和其他建设事业；由于县联社有权调度公社的适当部分的财力、物力，去进行全县性或超县性的建设事业，等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种全民所有制的成份，就象在面糰里放了一些酵母一样，加速了使面糰变为面包的发展过程。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里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就会加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发展过程。现在有人担心，怕把某些全民所有制的成份（工厂、企业、财贸信贷机构等）下放到公社，会使全民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倒退一步。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在我们的条件下，这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正好象全民所有制渗入私营企业把私有制提高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一样。因为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表明：在适当条件下，那种先进的因素会起积极作用，推动它的对立面向自己转化。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人民公社里这种全民所有制的成份将会继续增长，直至完全代替集体所有制。如果看不到这种转变的规律性，不及时地发展和完成这种转变，老是维持集体所有制的现状，让公社社员的眼光只局限在较小范围的集体利益的圈子里，那将妨碍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人民的觉悟的继续提高，因而会犯象合作化高潮前夕有些人所犯的右倾保守的错误。

但是，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些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集体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是适应当前生产力水平的。我们面对的是基本上使用人力和畜力，生产水平不高的农业，我们面对的是刚从个体的、私有的变成集体的、公有的农民。不要以为一九五八年农业的大跃进，农民的冲天干劲，就说农村走在前头了，农民第一了。这是现象，不是本质。不错，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的成就是伟大的空前的，农民的干劲和风格是很高的。但是农业的收入还是不多。要知道，没有很丰富的产品是不可能实现全民所有制的，全民所有制的集中表现，如前所述是能够实现由国家调拨，能够有

許多东西从公社調出来，又有許多东西調进去，如果产品不丰富怎么能进行这种調拨呢？如果不能进行調拨，硬是要实现全民所有制，对国家沒有好处，对农民也沒有好处，这只能造成农民消极依賴国家的情绪；从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农民問題仍然是个根本問題，必須謹慎小心，我們應該利用集体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使农民在一个集体的范围之内更能关心生产，因为他們更能看到生产的发展会直接改善本身的生活。而且由于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存在，便自然会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我們知道小生产者是不能剥夺的，现在，只要我們废除商品，实行調拨，那就在某种意义上等于剥夺，因而还有可能脱离农民的危险。因此，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快慢，只能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个过渡还得經過一个相当长的時間，才能实现。而且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实现这种过渡也只能分期分批地完成。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人民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談，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的人民公社一建立起来就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也是錯誤的和不能成功的。

要使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保証人民公社社員收入的稳步增长，最主要的条件是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努力实现公社的工业化和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沒有一定的工农业生产水平，是不可能实现全民所有制的。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說：“发展生产是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中心环节。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正确方針应当是：根据国家統一計劃和因地制宜的原則，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則，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这是发展生产的辯証法。服从国家計劃又要因地制宜，国家計劃是全民性的，服从国家計劃就是为实行全民所有制准备条件，但是又要从当地具体情况出发，不能主观主义。既搞好农业又搞好工业，两条腿走路是为了互相促进。过去农民只管种粮食，现在粮食已經过关了，就有可能使农林牧副漁五业来一个大革命，全綫丰收。农业的发展又要求办工业，因为办工业可以为农产品加工，可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可以更好地滿足人民生活。发展自給性生产和发展商品性生产，又是两条腿走路，这也是为改善人民生活 and 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所必需的。当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并不是以生产的极大高度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絕對全面的完成为前提。我們沒有完成工业化，沒有足够的农业机械，并沒有妨碍我們在一定的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觉悟水平的基础上，先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公社化，同样，只要我們在生产方面有一定高度的发展，和人民觉悟有一定水平的提高的条件，即使沒有全面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也有可能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 三

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建成社会主义，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經過較长的時間，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则需要經過更长得多的時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在分配原則上，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則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則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要实现这个更合理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則，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了以后才有可能。

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和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的任务是互相联系着的，我們在实现这一个阶段的任务时，就必须为下一阶段任务的实现准备条件，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論所要求的。

现时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是同时进行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已經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設还没有完成。怎样才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呢？在所有制方面，要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除了国营企业已是全民所有制外，还要把公私合营企业轉变为完全的全民所有制，把农业和手工的集体所有制轉变为全民所有制，使它們能够根据国家計劃生产，根据国家計劃調拨。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不断地发展生产資料的生产和消費資料的生产，极大地提高这两个部类的生产力水平。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要彻底解决衣食住方面的問題；实现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使劳动“从沉重的負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文化

教育方面，要普及中等教育，使有条件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方面也要大大提高。那时，已经基本地消灭了阶级，不仅要最后地消灭剥削阶级，而且又要逐步地消灭工农两个劳动阶级之间的差别。要达到这样高的标准，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一个较长的艰苦奋斗的过程。

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也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增长的过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第一，需要物质条件的无限丰富。只有物质条件无限丰富，才有可能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第二，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大大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要从私有观念的狭隘的圈子里解放出来，从而在思想上争得自由。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集中表现，是拼命劳动，不计报酬。只有树立了忘我的、无报酬的、无条件的劳动的观念，才能逐步地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第三，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要大大提高。使人人有可能掌握各方面的知识，使人人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上述三个条件是基本的主要的，通过这些条件，以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和消除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实现真正平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

目前，人民公社所实行的供给制，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萌芽；人民公社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和互相结合的方针，能够日益丰富社会的产品，为缩小城乡差别开辟道路；人民公社实行“三化”，大办托儿所、公共食堂，和大大发扬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劳动精神，逐渐使劳动转变成不是维持生活的手段而是生活中的第一需要，等等，都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不断增长的共产主义因素即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随着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随着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实现，随着公社分配制度中供给部分的逐步由少到多、供给部分标准的由低到高，以及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日益提高，全民教育的日益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逐步缩小，国家政权对内作用的逐步缩小，等等，都使共产主义因素逐渐增长起来，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逐渐成熟起来。这是一个新质因素逐渐成长、旧质因素逐渐消亡的过程，忽视甚至阻碍这一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无疑是不适当的。

但是，正如六中全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在目前阶段，主要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办事，根据这个阶段的质的规定来制定方针政策。在对待分配制度的问题上，应该主要还是按照“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办事，而不要过早地完全地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在人民公社中供给部分尽管将逐渐增长，但是只要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按需分配时，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主要地位，工资标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还要有较快的提高。这是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满足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需要。如果条件不具备时，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制度，是不利于社员劳动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的。企图过早地否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过早地消灭商品、价值、货币的积极作用，显然是不适当的。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满、最幸福的社会，我们不应该也不容许降低共产主义的标准，企图草率地、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又要以无限热情，积极工作，创造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好一切准备。

# 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

陈 迅 之

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五亿农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一經出现，就成为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进一步跃进的伟大力量。仅仅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它就在生产、分配和生活各方面表现了伟大的优越性，給广大农民带来許多显著的利益。

同时，正如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所指出，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內职能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这就是說，人民公社組織的建立和发展，使我們找到了一种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和具体途径。

要使我国拥有五亿人口的广大农村实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无疑是一件十分艰巨和复杂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党和毛主席还在1956年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就已經指出了我国农村实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基本方向，即在初期，农村中的改革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輔，繼之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最后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人民公社的建立为按照这个基本方向来建設我国农村找到了一条具体的道路，从而使我国农村不論在社会改革方面，还是在技术改革方面，都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发展。

过去，曾經有人設想，在农村中，只能发展农业生产，工业則只能由城市来办，因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也只有依靠国家的工业基地生产大量的拖拉机、汽車、发电設備、化学肥料、以及其它各种农业机械来供应农村，才能办到。这样，要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就只好經過一段漫长的岁月。因为要用现代技术来装备我国的农业，使可以用机器耕种的土地都用拖拉机来耕种，据統計共需拖拉机120万到150万台；化学肥料如果普遍使用起来，仅氮肥一項每年至少就要2,000万吨。只靠城市来供应这些东西，自然不可能在較短的时间内解决的，因此，有些人就以为在我国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是遙远的将来的事情，必須慢慢来。

但是，在党的正确方針的指导下，几个月来，我国各地人民公社在綜合发展农林牧副漁五业的同时，还大办工业的經驗証明，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可以在国家的大工业的支援下，通过人民公社办工业的道路来实现。人民公社所办的工业，有輕工业和重工业（例如广东省新建的430多个大小型鋼鉄基地，就有300多个属于公社办的）。它們既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員日常生活的需要服务，又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动员和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提供强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农村工业蓬勃地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县和公社所办的各种工业单位就有六百多万个），也可以促使国家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以便更有力地支援农村工业的发展，从而大大地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这样，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就不是什么遙远的将来的事情，而是經過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之后，就可以比較快的实现了。可见，人民公社在国家的支援下大办工业，是一条逐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多快好省的道路。

## 二

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是因为，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虽然已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但是，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现在基本上还是属于公社所有，而不是全民所有。因之，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只能在公社的范围内，或者在县联社的范围内进行调拨。不过，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这就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如何使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过去，曾经有人设想，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就是进入共产主义了。也有人主张干脆地把集体财产收归国有，宣布为全民所有的办法来实现这种过渡。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已经正确地指出这样来对待集体农庄的财产“是完全不正确的，是绝对不能采纳的。”从我国农业的社会改革（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来看，这种办法当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国工农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可以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失去作用的地步。目前，我国的商品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如果对集体所有制的农民采用剥夺的办法，来实现这种过渡，那么，就会伤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同时，城乡之间的联系就会完全中断，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归根到底，会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造成很大的不利。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使我们找到一条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这是因为：一、人民公社使农村中原有的集体所有制进一步扩大和提高。二、人民公社中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它将会随着人民公社的发展而逐步扩大和发展。三、在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基础上，若干人民公社将联合起来成立县联社。县联社的成立，是进一步发展生产、促进集体所有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重要步骤。因为在县联社的统一领导下，可以有计划地“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增加公社生产资料的全民性部分，逐步增加公社产品由国家统一分配部分”的办法，来一步一步地扩大全民所有制成分，缩小集体所有制成分，并且在条件成熟时，顺利地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四、随着人民公社的展发，广大农

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将会进一步提高。所有这些，就使集体所有制易于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可见，通过人民公社的道路，采取逐步扩大公社中全民所有制的成分的办法，来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完全符合于我国农村的具体情况，符合于事物发展的规律。

## 三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将完全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但是，如何由“按劳分配”转变为“按需分配”的问题，过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曾经有人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原子化”等等条件之后，便可从“按劳分配”一下子转变为“按需分配”。他们把“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机械地割裂开来，只看到了生产决定分配制度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分配制度对于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有些人虽然提出实现“按需分配”的条件，“是要逐渐准备起来的。”但是，究竟通过什么道路去准备条件，以便促使这种转变的实现，也还是不明确的。

党和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分配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情况，和广大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在人民公社中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虽然基本上还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它的性质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它已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即“按需分配”的因素。实行这种分配制度，是我国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它使我们找到了由“按劳分配”逐步转变为“按需分配”的最好形式和具体途径。因为实行这种分配制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广大农民几千年来愁食愁穿、愁柴米油盐酱醋菜的大问题，使他们吃饱穿暖，“得到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便于在生产有了极大发展，和人民觉悟大为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按需分配”的部分，以便在条件成熟时，顺利地过渡到完全“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从现有的经验可以看到，人民公社通过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来逐步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也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这种分配制度的实行，将会有力地推动生产的更大跃



进，大大地提高社員的思想觉悟，从而为逐步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准备必要的条件。

## 四

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縮小以至消失，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促使这三个差别的逐步縮小以至消失呢？这同样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过去，当人們談到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消失时，往往只偏重于討論从所有制形式方面，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办法；談到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消失时，也往往是偏重于談論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

固然，用提高工人（包括农民）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来使工农群众在体力和智力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是使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极为重要的步骤之一，但是，这个办法还没有解决如何使为数相当众多的从学校培养出来的脱离体力劳动的腦力劳动者，也能够体力和智力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此，这个办法是不够全面的。

我国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发展，也为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逐步縮小以至消失，指出了一条具体的道路。

首先，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和互相結合的方针，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大办工业。农村中的工业发展了，不仅可以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使工业和农业接近并且联系起来，而且可以使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人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例如，著名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順达所领导的金星人民公社，目前就已有70%的男女劳动力做到“下田是农民，进厂是工人”。这样，工农之间的差别就将会逐步縮小以至消失。其次，在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基础上，农村的劳动条件、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将会与城市接近并且統一起来。最后，人民公社在綜合发展公社經濟的同时，还要兴办小学、中学、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种科学研究事业，逐步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在学校教育中，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针，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厂、农场和公社也办学校，这样，就会出现学生即是工人农民，工人农民也即是学

生的新现象，使公社成员的体力和智力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而成为一专多能的多面手，这样，就可以为培养“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們自己的爱好，輪流从一个生产部門轉到另一个生产部門”，而“不是只有一个專屬的活动領域”的新人創造良好的条件，从而使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有可能逐步縮小以至消失。

## 五

国家对內职能的逐步縮小以至消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結果，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

馬克思主义的經典作家，还在十九世紀时代就已經預见到，“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自己使自己成为贅物，”（引語見“論共产主义社会”）而将会消亡下去。党和毛主席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說的基本原理，根据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經驗，提出了政社合一。由于政社合一，就使人民公社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結構的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組織的基层单位。由于政社合一，国家政权的基层单位——乡人民委员会，就与公社合而为一，并且成为公社生产和生活的直接組織者和领导者。若干人民公社联合起来組成县联社之后，县一級的政权也将与县联社合而为一，而成为生产和生活的直接組織者和领导者。公社中过去的地、富、反、坏和其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需要繼續监督其参加生产劳动者，則交由公社监督劳动，他們如敢违犯政府法令，破坏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仍将受到法律的惩办。这样，国家的对內职能（即专政的作用），在政社合一之后，虽然仍在繼續发挥作用，但是，随着人民公社的发展，随着公社在领导和組織公社的生产和生活方面的任务的加强，国家对內职能将会逐步縮小，以至在将来条件成熟时自然地归于消失。

人民公社象初升的太阳一样，放射出万丈的光芒，照亮了通往美滿幸福的共产主义的大道。我們完全可以确信，人民公社将会以它那强大的生命力，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并且为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使我国有可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稳步地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时代。

# 关于人民公社当前的分配制度

孙 孺

由于我国一年来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取得了伟大成就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引起了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它体现在分配制度方面，是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部分，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这是我国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是目前广大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这对我们来说，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新问题，其中有很多问题应当加以研究，明确认识。关于这问题，笔者在“试论人民公社的性质”一文（载“理论与实践”十月号）和“谈谈人民公社经济政策的两个问题”的书面发言（载“理论与实践”十二月号）中，曾经简略地论述到。现在就学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初步体会，对目前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几个问题，再作一些探讨。

为什么說目前人民公社实行的分配制度，是我国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一个创举呢？

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在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和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在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未达到极高的程度，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能充分满足每一个人的合理需要的程度；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品质和文化水平还没有达到极高的程度；劳动还未能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还存在。因而不能不采取“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即人们尽其所能为社会劳动并按其所付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不同的报酬的方式来进行消费品的分配。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极高程度的基础上，社会产品极丰富了；人们的共产主义

觉悟、道德品质和文化水平极大地提高了；三个差别逐渐消失了；劳动真正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了，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即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地尽其所能为社会劳动并按各人不同的需求充分满足地得到他对物质的和文化的一切合理需要。

我国农村在人民公社化以前——即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所采取的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的方式以及工厂、矿山和城市所采取的以工资形式（包括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进行分配的方式，都是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使我国社会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引起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体现在分配方面是农村人民公社在分配给个人消费的部分，已普遍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制度基本上仍然是“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供给制部分已打破了“按劳分配”的某些界限，开始按照基本满足社员的某些生活必需来进行分配，而不仅仅是按照社员所付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进行分配，如目前农村人民公社较普遍实行的伙食供给制。这就使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萌芽。这种分配制度的特点在于：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下又带有若干共产主义因素。并指出了由“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具体道路。所以说这是我国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

这种分配制度是在怎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呢？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分配制度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生产关系的其他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它主要是随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转移。而另一方面，它又直接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客观的规律，不是

由人們的主觀願望任意選擇和取舍的。

當我國農村經濟基層單位還是農業生產合作社（這裡指的是高級社）形式的時候，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低，農產品（包括糧食、油料、畜牧、漁業和其他作物等）還很不豐富，產品的數量和質量也還不穩定。因而在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時，對社員個人消費部分的分配，只能採取按勞動計工分、夏秋預分、年終決算的辦法。這種分配方式和過去比較起來，是大大改善了農民的生活。但還不是很完善的、很合理的。因為它還存在着貧富懸殊的不合理狀況：勞動力少人口多的家庭，生活改善得不那麼快，甚至還要為吃穿耽憂。有些家庭的伙食費就占其總收入的70—80%。勞動力多而強的家庭則收入多，過着較富裕的生活。這就存在着實際上的不平等的狀況。但在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條件下，能不能實行每天三頓干飯管飽不要錢的伙食供給制呢？能不能實行對每個社員供給一定數量的衣着、棉被之類呢？顯然是不可能的。原因就是當時的糧食作物和其他農作物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農業社的收入也還很低，首先糧食產量就不能保證每天三頓干飯的供應量，根據當時農業社的收入狀況，也不能保證按每個社員供給一定數量的衣着。那末，能不能實行工資制呢？也不可能，因為農業生產還不夠穩定，農業社還不可能有保證地預計全年的收入。因而採取按勞動計工分，到年底核實收入後，才確定每個勞動日的所得（以貨幣計算）進行分配，這是適合當時生產力性質的分配制度。只有採取這種分配方式，多勞多得，才能促進社員的勞動積極性，促進生產的發展。

自去年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之後，工農業生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農業方面，尤其是糧食獲得了特大的豐收。以廣東來說，糧食產量已由1957年的240億斤增加到620億斤以上，全省平均每人已有糧食1,660多斤，基本解決了本省的糧食問題，其他農業生產也有很大的發展。同時，在人民公社化以後，使原來單一的農業經濟組織成為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經濟基層單位和社會主義政權組織的基層單位，具有大和公的特點。為了適應人民公社今後在更大規模上發展工農業生產，就要求調動更多的勞動潛力和提高社員群眾的勞動積極性，要求在更大的範圍內統一地安排和調度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再加上經過全民整風運動，人們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水平比前有所提高了。在這種需要和可能的基礎上，就引起了生產關係的某種變革：使原有的

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擴大和提高了，並帶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人與人的關係大大改善了；在個人消費的分配方面也出現了目前的新的分配制度。

其次，在我們黨所領導的革命隊伍中，在歷史上有實行供給制的長久的優良傳統，它對農村中廣大的農民具有深厚的影響。實行這供給制的分配方式，易為廣大農民所接受。

最後，這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的階段論相統一的理論指導下，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的結果。一方面不把不同質的階段互相混淆起來，一方面又認為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沒有隔着也不可能隔着不可逾越的鴻溝；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斷發展、不斷前進而不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社會，因而與它相適應的社會分配方式，雖然基本上是按勞分配，但不應當象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樣，似乎可以不理睬生產和社會組織的發展和前進，既然是社會主義，就只能實行按勞分配，而應當隨着有所改變，即：與生產和社會組織的發展相適應，在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下逐步地帶有某些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因素，而且這個共產主義因素將隨着生產和社會組織的繼續發展和前進而逐步提高和擴大，為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在分配制度上奠定基礎。不能設想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是在低級階段中開始含有高級階段的萌芽並逐漸成長，不是由量變逐漸到質變，而是互不滲透，截然隔開，到有朝一日便可以來一個突變。

人民公社目前所實行的分配制度，就是在上述物質的、思想的、理論的基礎上產生的，是合乎客觀發展的規律的。這種分配制度一經實行，就顯示出了很大的優越性。貧富懸殊的距離大大縮小了，勞動力進一步得到解放，這正是目前廣大社員群眾的迫切要求。因而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了，黨群關係空前密切了，它既適合於當前生產力的性質，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加速建設社會主義，又為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在分配制度上开辟了具體的道路。

## 二

為什麼說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它的基本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呢？

如上面所述，“具有共產主義的萌芽”，指的是供給制部分已經不是按照社員所付出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作標準來進行分配，而是開始按照基本滿

足每个社员的某些生活必需来进行分配，如包吃饭就是按人口基本满足伙食的需求而不问是否参加劳动以及劳动的数量质量如何。但这种共产主义因素还仅仅是一个萌芽，和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还有很大的差别。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必须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基础，就是说：第一、必须产品极丰富；第二、在高度的机械化、电气化的大生产和全民达到高度的文化水平的基础上，逐渐消灭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第三、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极大的提高，劳动真正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但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而在供给部分，还不能完全采取“按需分配”。首先，供给部分只能根据某些产品的发展状况，限于基本生活需要的某些部分。例如在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下实行伙食供给制。还没有可能将供给的范围过于扩大。其次就是已经实行供给的部分，也还不可能充分满足人们的不同的合理需要。例如实行伙食供给，除了满足吃饱的基本需求之外，对于蔬菜和肉类还是限制于较低水平的数量和品质。有些公社虽然实行包衣着，也只能根据整个国家的生产状况限额供应并限于一定质量的布料。这些供给制，都还不可能做到充分满足每个社员的不同的合理的需求。如果认为这样的供给制就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了，那就只能是“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对当前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都没有好处。

再就这个分配制度的整体来看，“按劳分配”的工资制部分还占着很大的比重。带有“按需分配”性质的共产主义因素还只是萌芽，还是在量变开始的过程，没有引起整个分配制度的质的变革，因而还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基本性质。只有“随着社会产品由于全国工农业日益高涨，逐步由不丰富到丰富，公社分配制度中的供给部分逐步由少到多、供给标准逐步由低到高，以及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日益提高，全民教育日益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缩小，国家政权对内作用逐步缩小，等等，随着这一切，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将逐步成熟起来。”到那时，才能进一步引起分配制度基本性质的改变，即由按劳分配变为按需分配。

既然整个分配制度的基本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那末，在分配给社员消费的总额中，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应各占多少才最适合于当前的情况呢？

这主要取决于各个公社生产发展的不同情况。同时，还必须从有利于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公社的生产，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出发来考虑。

首先应当考虑到，对社员消费部分的分配，必须使绝大多数社员（90%以上）的收入应比上年有所增加，对其余社员也要使其收入不致比上年减少。因为农民从去年以来，以冲天干劲来为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而苦战，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生活得更美好。如果在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大大发展了，而结果却没有增加收入甚或减少了收入。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奔头呢？那就必然会影响到劳动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生产。因此，供给的范围就不宜过宽，比例也不能过大。而工资部分则比例不宜过小。根据本省的情况，一般的比例大致是各占一半，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的比例，最多也不要超过六与四之比为宜。除此之外，还必须使社员整个收入水平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才能使劳力强人口少的户保持不会减少收入或略有增加。

其次，既然目前分配制度的基本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因而“按劳分配”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分配方式。人们在生活中的比较复杂的需要，在今天的条件下，只有通过按劳分配原则的工资形式的收入，才能比较易于满足。为了较好地能满足社员的这些需要，促进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使之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使社员所得的工资逐步增加，而且在若干年内还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得更快。因为“按劳分配”原则虽然还不是最完善最合理的分配方式，它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但在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低的条件之下，凭人们的主观愿望企图过早地抛弃它，那是违背客观的发展规律，因而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 三

怎样正确看待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关于分配制度的政策呢？除了从上述的理论上明确认识之外，还须消除某些思想上的误解。

有一些人，看见人民公社分配制度中的供给部分带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对于“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句话又有所误解，把当前人民公社的性质，看作已经是共

产主义的性质，最少也是开始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这些误解，主要是忘记了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既然是把人民公社的性质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或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性质，当他们处理公社的分配原则时，必然就会不是根据公社生产发展的情况而是根据对共产主义热爱心切的主观愿望，把供给的范围铺得过宽，以为愈包得多就愈显示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例如有个别公社提出了包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如果都实现，那就是基本上进入共产主义了。但是，在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条件下，这是办不到的。勉强实行，对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也没有好处。实践的經驗也已经证明，包得过多的公社问题就多。因为包得范围大了，使公社的生产绝大部分都要变为自给性的生产，能拿出去作为商品交换的只占极少部分，这样就直接影响了为扩大再生产而必须保证的积累。有不少包下来的生活消费品公社不能自行生产，必须依靠交换来供应的，也会感到困难。尤其是在计划安排今年的生产发展和基建投资时，更会感到有些捉襟见肘，难以应付。同时因为包得多，就很难做到保证90%以上的社员比去年增加收入，其余社员的收入也不致减少。

另一方面，也必须防止另外一种偏向。如果认为既然人民公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仍然是人民公社的主要的分配原则，工资制部分在

长时期内还占重要地位，因而就用消极的态度来对待供给制，没有认识到供给制部分的共产主义因素是广大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它不仅在现在发掘了劳动的潜力，促进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而且为将来过渡到按需分配指出了具体的道路。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将随着人民公社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有所增长。在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中，分配制度中的供给部分是将逐步由少到多，供给标准逐步由低到高。随着各方面的条件发展，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将逐步成熟起来。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及时地英明地指出了消除这些误解的必要性。因而只要认真学习 and 深刻地体会决议的精神实质，把分配问题提高到理论上认识。在明确了目前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又看到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部分的优越性，根据生产发展的情况，对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现时对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障碍的部分予以破除，而对那些有用的部分，则予以保留，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更重要的是认识发展生产是中心问题，只有正确地贯彻和执行党的关于人民公社发展生产的：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同时并举、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一切有关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暂时的某些思想混乱和偏向也就可以消除。

## 广州市南区成立工人哲学研究会

广州市南区工人在中共南区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最近成立了工人哲学研究会。这个“工人哲学研究会”是在前一阶段各厂工人普遍开展学习哲学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区各厂工人在上一阶段学习哲学以后，思想觉悟大大地提高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了显著的改进，他们干劲更加足了，跃进的幅度更加大了，生产指标比以前提高了，总之各厂都出现了新的面貌。这一切增强了工人们学习哲学的愿望和兴趣，各个厂的工人都普遍要求学得更好，学得更深。中共广州市南区委宣传部为了满足工人们这种要求，把工人学哲学运动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培养出一支工人的哲学理论队伍，决定成立工人哲学研究会。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是在上一阶段的哲学学习中涌现出来的思想进步、学习积极和学习成绩显著的各厂工人。该会准备定期组织讨论会，讨论会员提出的哲学论文和各厂工人学习哲学中所提出来的理论性的问题。

南区工人哲学研究会的成立，不仅说明工人群众不但能够学好哲学理论，能够运用哲学理论研究实际问题，而且也说明过去那种少数人垄断哲学的时代已过去了。

(洪潮)

# 論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

陈文川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人民公社無論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既要发展直接滿足本社需要的自給性生产，又必須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生产。……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內，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换，必須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人民公社为什么必需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生产呢？因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不但农林牧副漁結合，而且工农业并举，这就决定它有条件进行多种經營，全面发展生产。然而，一个公社無論规模多大，資源条件和技术条件如何优越，要做到全部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完全自給是不可能的。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逐步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就必须不断地增加农业机器、电气器材和大型的机械設備、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等等，而这些生产資料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由公社自己全部制造出来的。这就需要向社外購買，也就是說需要別的公社或国家的商品供应。还有，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每个公社必須逐步提高社員的生活水平。而社員的生活需要从吃的、穿的、用的以至文化娱乐等各方面，必然是丰富多采，日益复杂，这些日益增长的需要，也决不是一个公社所能完全滿足的。因此，为了不断地发展生产和不断地改善社員的生活，每个公社除了发展自給性生产之外，还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生产，以便同別的公社和国营企业进行商品交换，換回必要的机器和設備，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換回所需要的消費物資和現金，以供应社員生活需要、增加积累和发放工資，并使工資逐步增长。广东省韶关市郊区樟市人民公社除了搞好自給性生产外，还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卖出的木材、石灰石、木炭、木柴、砖瓦、石灰、生猪、鷄、鴨、鵝和粮食共值五百八十六万元。去年全社总收入比前年增加四倍，其中商品生产收入占公社总收入百分之四十四强。河北省行唐县通过“十大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出售了大量的肥

猪和鮮蛋，使公社和社員得到大量收入，全县每人平均收入一百四十六元，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六。从去年各地人民公社分配的情况看来，凡是进行多种經營和商品性生产較大的公社，收入就較多；單純依靠粮食生产的公社，收入就較少，这就說明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生产，对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

人民公社发展商品性生产，还不仅仅是为了公社和社員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公社和社員的利益是一致的。人民公社是整个国民經济的一个組成部分，各个地区之間、各个公社之間，应该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特点来发展生产，互通有无。这是最經濟最合理的社会分工。由于公社生产规模不断地扩大，它一方面需要从国家和別的公社得到各种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另一方面，还要以各种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手工业品、工业品等）供应国家和其他公社。随着社会主义建設的跃进，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經济的日益繁荣，对外貿易的日趋发展，对农产品、畜产品、木材和林产品、土特产品和水产品的需要量和品种，都将日益扩大。如果公社对一些产品，特別是一些主要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不足，将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高速度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而在目前，很多产品的产量和品种都远不能滿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例如蔬菜、生猪等副食品和油料作物供应紧张，麻类纖維的产量約为当前社会需要量的50%，羊毛的产量只能滿足毛紡織需要量的60%左右，茶叶、家蚕茧、柞蚕茧的产量，至今仍然未能达到战前最高年产量的水平，也不能滿足国内和出口的需要。至于水产、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品，也都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因此，人民公社必須发展多种經營，搞好副业生产，給国营企业提供大量的工业原料，給对外貿易提供大量的土特产品，并給市场提供大量的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物資。只有这样，才能滿足国家和人民各方面的需要，才

能加速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说，只有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能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提高公社的生产力，改善社员的生活。

人民公社广泛地发展商品生产在目前既很需要，那末是不是可能呢？完全可能。首先，全国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农村秋收和深翻土地任务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各地钢铁生产的任务也已经胜利完成，虽然各地兴修水利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运输力，但陆续抽回一部分劳动力和运输力来搞多种经济是可以办到的。况且有些多种经营的生产，如喂猪、养鸡、编织、采集药材等，不一定需要强劳动力和全劳动力，老人、妇女、小孩都可以胜任。其次，我国地大物博，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东海到帕米尔高原，到处都可以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多样的生产，潜力很大，这就给人民公社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商品生产的道路。同时，各地公社在大办工业的过程中，已经打下了四类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为社员生活服务的、为农产品加工的、建筑材料）的初步基础，这就有可能在发展这些工业的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尽量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此外，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改进，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办法以后，可以进一步发挥财贸工作对公社生产的促进作用。国家在农村的商业、粮食、财政、银行等财贸部门的人员和资产全部下放给公社使用和管理以后，就可以进一步为公社解决资金、种籽、种畜、种苗、肥料等等问题，进行大购大销，并在业务指导、技术帮助、干部训练等各方面给以援助与支持，在当地党政的领导下，不断地发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

人民公社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但是，目前对这个问题，在思想认识上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公社的产品和社员需要的生活资料就可以全部由国家调拨，何必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当前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我国目前存在着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目前农村的人民公社，尽管包含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形式。人民公社的主要生产资料都是社员的集体财产，不是全民的财产；公社的产品，除小部分以农业税的形式归国家直接支配外，绝大部分仍然由公社自己支配；社员的劳动报酬是由公社根据收入情况合理分

配的。

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与国营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既有区别，国家就不能象对国营企业那样，按照国民经济需要来支配和调拨公社的产品。如果宣布把公社的一切产品都由国家调拨，那就等于把公社的产品无代价转为全民所有，这无异是对农民的剥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损害到广大农民的利益，妨害工农联盟的关系，不利于发展生产。那末，国家是不是可以对人民公社进行无代价的产品分配呢？也不能。因为这种做法，事实上是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党中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关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群众觉悟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生产水平还不够高，“一穷二白”的状况尚未根本摆脱，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相差还很大，人民的收入和觉悟程度也很不一致，所以，现在还不能急于改变集体所有制和消灭商品交换。人民公社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但现在它还只是刚刚在东方升起的太阳，时间短，优越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只能采取适当步骤，逐步增加公社的全民所有制的成份，逐步增加公社的产品由国家统一支配的份额，才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正因为这样，国家同农村公社之间、公社同公社之间，现在仍然必须按照商品流通的规律来实现产品的相互交换。这种交换关系，仍然是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之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是继续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措施。

有人问：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等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人民公社要发展商品生产，会不会恢复资本主义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着生产资料，劳动力成了商品，他们雇佣工人，剥削工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包罗一切的，它是一种自发发展的商品生产，完全受价值规律所支配，它具有的是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是私有财产，劳动力不是商品，没有雇佣关系，没有剥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是受到限制的，它是一种有计划的组织起来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没有竞争，没有生产无政府状态，没有危机。我

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已经归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劳动人民是企业的主人，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雇佣关系和剥削制度已经消灭。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范围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国家分配给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人民公社交给国家的产品，公社分配给社员的产品，国家供给工作人员的消费品等等，都不是商品。但是，通过买卖交换的商品仍然是相当大量的，人民公社与国营企业之间，人民公社之间相互买卖的，消费者向国营企业、人民公社购买的产品，都是商品。但是，参加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集体的生产者，而不是资本家和个体小生产者。这种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

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不是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的，而是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进行的。难道这种商品生产还会恢复资本主义吗？

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货币等虽然曾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而存在，也曾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服务；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定的范围内还有积极意义，能够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服务。因此，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错误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 广州市举办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会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为了进一步深入普及提高广州市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动生产和工作更大的跃进，于去年12月30日，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了为期暂定一个月的“广州市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会”。

展览会通过典型介绍，向人们展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由于广大工农群众、机关干部，认真地贯彻了党的理论教育方针，从实际出发，把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与当前的思想、生产、工作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就能通过学习，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创造出生产、工作上的奇迹。展览会以图画、照片、文章、诗歌和实物，具体地生动地反映了广州市人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后，不但可以多出钢铁，多打粮食，多出机器；而且帮助公安干部破了难案，帮助农民驳倒了“吃亏论”，帮助街坊居民正确处理了大跃进中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矛盾，帮助小学生搞好了团结。这些事实使观众深刻地认识马列主义理论的威力。

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是这个展览会的特点。展出的统计表说明：截至去年十二月底止，全市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人数已达78万多人，占全市人口36%。参加学习的有工人、农民、居民、学生机关干部、文教卫生工作者、商业工作者，有青年、妇女，也有白发老翁和七、八岁的红领巾。其中工农群众占63%。此外，还建立了党校602所，红专学校1,552所，成立了23个工人讲师团和5个农民讲师团。全市4,328名理论教员和25,547名辅导员中，工农成分占72%。

展览会的展品还反映了广州市人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后，破除迷信，著书立说，大写文章。去年9—12月全市共写出理论文章154,032篇，其中属于工农群众写的91,868篇，占总数的60%。

（浩洲）



# 論工業戰綫的群眾運動

楊 繁

一九五八年我們在工業戰綫上取得了空前的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証明了辦工業必須大搞群眾運動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在北戴河會議上確定了震驚世界的生產1070萬噸鋼的同時，提出辦工業必須大搞群眾運動的方針。短短的幾個月里，鋼鐵戰綫上就掀起了一个轟轟烈烈、勢如破竹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進一步改變了少數人冷冷清清辦工業的局面。幾千萬工人、農民、學生、幹部和城市街道居民大辦工業，掃除了各種各樣的清規戒律，打破了所謂“正規化”思想，曾經被人貶為“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的群眾路綫工作方法，在工業戰綫上恢復起來和大大發揚起來了。群眾路綫是黨的根本上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又是我們從事一切工作所必須遵循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不管是革命事業還是建設事業，不管是工業還是農業，都離不開群眾路綫、群眾運動，如果只有少數領導人的積極性，而沒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結果只是少數人的空忙，很少有成功的希望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我們黨長期的實踐所一再証明的真理。可是，人們在口頭上承認這個真理是一回事，在實踐中運用這個真理又是一回事，在這種工作中承認這個真理是一回事，在其他工作中承認這個真理又是另一回事。人們的認識規律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對於認識和掌握群眾運動這個真理也是如此。不是有許多人認為革命可以搞群眾運動，建設不可以搞群眾運動嗎？等到農業方面的群眾運動轟轟烈烈地搞起來，農業的高產“衛星”一個接着一個升天的時候，他們便只得改口說：農業可以搞群眾運動，工業不可以搞群眾運動。等到鋼鐵工業的“小、土、群”運動搞起來了，他們又說煉鋼煉鐵可以搞群眾運動，小型企業可以搞群眾運動，而其他工業、大型企業不可以搞群眾運動。幾個月來工業戰綫的群眾運動，正是和這些“反對派”作鬥爭中發展起來的。

群眾運動的“反對派”把在工業戰綫上搞群眾

運動說成是“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是糟得很。如果這“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指的是我黨數十年來在農村工作中、在軍事鬥爭中所積累和總結起來的無往而無不勝的群眾路綫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所培養起來的聯繫群眾、聯繫實際、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那應該說是好得很。實踐證明，實行所謂“正規化”，依靠少數人冷冷清清的辦工業，其結果是少慢差費；而大搞群眾運動，依靠全黨全民轟轟烈烈的辦工業，其結果是多快好省；並且是否相信群眾、敢於發動群眾去破壞舊世界和建設新世界，從來就是工人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分界綫；因此，工業戰綫要不要大搞群眾運動之爭，不僅是兩種方法之爭，也是兩條工作路綫之爭，是工人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之爭。

群眾運動的“反對派”否定了“農村作風”，而提倡“城市作風”，所持的理由是：“農村是簡陋的，不講究物質條件，城市是文明的，必須講究物質條件；農業是依靠農民的双手，簡陋一些也不成問題，而工業則依靠機器，就非要講究物質條件不可了。”在他們看來，搞群眾運動的“農村作風”是不講究物質條件的，因而是不適用於工業建設的，只有講究物質條件的“城市作風”，才適用於工業建設。因此，他們強調物質條件的作用，強調了機器的作用，而不去強調人的作用。要發展工業生產嗎？請拿設備來，請拿機器來。

無疑地，機器設備是工業建設的一個重要條件，但不是唯一的條件。工業生產力有兩個基本方面：人和機器。生產力水平的標志，通常是以機器發展的程度來衡量的。但是機器設備從那裏來的呢？是依靠人去創造；有了機器設備又怎樣去發揮它的作用呢？還是依靠人去運用。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機器是靜止的東西，人的力量是無窮的，要把死的物變成活的，把靜止的機器開動起來，是取決於人的主觀能動性，取決於對“物”的認識程度和掌握程度。因此，人才是最主要的。只有發動廣大群眾，同心協力創造和掌握設備條件，設備條

件才能更快地創造出來，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

那種見物不見人的思想，實質上還是一種資本主義思想的表現。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過：資產階級為了使機器成為它剝削工人的工具，便極力強調機器的作用；並千方百計迫使工人成為機器的奴隸。當然機器是死的，但掌握在資本家的手里，它便賦予了資本家的意志。那時候，機器是工人的統治者、壓迫者，工人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活力都被窒息了。可是，在生產資料實現公有制的今天，人和機器的關係是應該倒轉過來了，人是機器的主人。現在不應該強調機器對於人的統治作用，而應該強調人對機器的主觀能動性。人的智慧是無窮的，人的力量是無邊的，只是由於舊社會生產關係的桎梏，它才被壓制着。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揭蓋子、開水閘，讓人的智慧的長流象長江黃河一樣滾滾地流出來。

正是由於他們過於迷信機器、設備，把工業建設說成是高不可攀的東西，因此，他們就片面地重視少數專家工程師的作用，而忽視廣大的勞動群眾的作用。無疑的，專家工程師是重要的，一定要發揮他們的作用，但光依靠他們也是不行的，因為專家工程師畢竟是少數，而工業建設則是全體人民的事業，沒有人民群眾的積極參加是不行的；而且要想真正發揮專家工程師的作用，也只有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在群眾的支持、幫助和督促之下才能更好發揮。有人擔心群眾不懂科學、不懂技術，讓他們亂干一場豈不是弄壞事了？不，不要把群眾估計過低了。勞動群眾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科學技術和機器設備本身原來就是勞動群眾創造出來的，只有發動群眾，機器設備才能創造出來，科學技術才能更快發展；而現有的工業技術設備也只有依靠千千萬萬勞動群眾通過不斷的實踐去掌握和運用，才能更好的發揮作用，如果“怕尿床就不讓睡覺”，不把群眾發動起來投入到工業建設中去，那末，不僅技術設備條件不可能很快的創造出來，技術力量也不可能大量成長起來，就是現有的技術設備也不能更充分的利用，這樣我們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了。

群眾運動的“反對派”否定了“游擊習氣”，而提倡所謂“正規化”，在他們的心目中，究竟什麼是正規化呢？就是一些固定不變的清規戒律，他們強調遵守規章制度、操作規程等等，說這些東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生怕群眾發動起來了，就會打破這些東西，變成天下大亂了。

“正規化”如果理解為按照事物正常的規律去

辦事，那無疑是很好的、必須的。可是什麼是中國的工業建設的正常規律呢？我們和這些群眾運動的“反對派”的看法是不一樣的。他們認為搞群眾運動太緊張了，太亂了，這是“不正規”，只有按部就班，四平八穩地來做，才叫做正規。我們的看法恰恰相反，不斷地推翻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不斷地打亂舊的秩序，創立新的秩序，正是這個“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飛躍的時代的正常規律。我們要擺脫歷史遺留給我們的貧窮和落后的重擔，要加速建設社會主義，要創造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不緊張地進行戰鬥行嗎？緊張不是外來的壓力，“打亂生活秩序”，是生活本身的要求，是反映生活的本質。我們有些企業的領導同志，迷信專家的權威，硬是不許工人打翻陳舊的操作規程，譬如有間紙廠的木漿車間，工人要把蒸煮木漿一次從四小時降到二小時，有些領導人員和工程師硬是不許工人這樣干，說蒸煮木漿不能低於四小時，已成世界定論，可是，工人悄悄地干了，成功了。可見，陳規是可以打破的，而且是必須打破的。規章制度是人們定出來的，操作規程不過是人們對於物質生產規律認識的一定程度的標志，它無疑對生產實踐有意義的。不過，隨着人們的不斷實踐，對物質生產規律的認識進了一步，或者情況發生了變化，舊有的規章制度和操作規程就不能適應了，必須加以改變，不能被這些東西束縛了自己的手足，如果過於迷信和拘泥於這種陳規舊章，生怕群眾發動起來會打亂這種東西，那末，我們就一步也不能前進了。

“亂”和“治”是對立的两面，沒有“亂”就無所謂“治”，不亂舊的科學結論，就沒有新的科學成果。人要是永遠沿着先人的腳印走路，一步不亂，就達不到新的天地。當然，大搞群眾運動，就會不斷激發群眾的大膽創造，打破陳規，打亂舊的秩序，但難道這不是越多越好的么？

強調“正規化”，否定“農村作風，游擊習氣”，因而不願意搞群眾運動的論據是站不住腳的。幾個月來，提前完成震驚世界的生產1070萬噸鋼的任務和其他工業戰綫上的勝利，正是大搞群眾運動的結果。而這些偉大的勝利，又正好粉碎了各種形式的不願意搞群眾運動的論據。大搞群眾運動這個思想，一旦掌握了群眾，便變成了威力無窮的物質力量。

工業上的群眾運動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小（小型）土（土办法）群（群众运动），一个方面是大（大型）洋（洋办法）群（群众运动）。这两个方面的群众运动，是工业方面的两条腿，缺一不

可。

小、土、群是我国发展工业的长远方针，是两条腿走路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小、土、群这个方针，虽然是三个东西，实际只有两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小、土是形式，群是内容，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又影响内容。目前我国群众最广大的还是农民群众，要大搞工业光靠现有的工人还不行，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来搞，而农民是几乎没有搞过工业的，要使农民在工业中有用武之地，就必须有一个使他们便于掌握的形式，这个形式是小、土的形式。譬如我们要发动农民搞钢铁，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全民大搞钢铁运动，就非要采用小土高炉的形式不可。因为小的和土的，群众在物质力量上能够拿得出来，在技术上容易掌握。采取这种群众能够做得到的形式，便能很快建立起高炉来，遍地开花，因此小、土的形式又促进了群众运动的内容，它吸引着和动员着更多的人来搞，它把运动带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势如破竹的速度上去。

小、土、群方针是从斗争和实践中确立起来的。这个斗争首先是思想斗争，赞成和反对的人曾展开过论争，论争的实质是建设速度问题，究竟是大、洋的快，还是小、土的快。我们认为大、洋的效率高，但是建设的速度慢。例如鞍山钢铁厂，生产效率高，这是优点，但建设速度慢。鞍钢是在日本人留下的基础上进行改建，现在还没有全部完成。小、土的一般说生产效率低一些（也有效率高的），但是由于小、土的群众自己可以搞，万事不求人，建设速度快。例如广东炼铁炼钢，在去年最后的四个月内就炼出生铁一百多万吨，炼出钢二十万吨，这个伟大的成就是破天荒的，没有小、土、群，是休想取得这样的成绩的。一个是大而少，一个是小而多，比较起来，前者慢，后者快，我们国家的特点是地大、人多，到底是那一种方法适合于中国的特点呢？肯定是小而多更适合于中国的状况，搞大、洋就会发生在很多地方建不了工厂的问题，搞小、土的遍地都可以建。而且搞小、土的也容易加番，大、洋的翻一番困难很多。

难道我们就不要搞现代化的大工厂吗？当然不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大工厂，工业技术水平就不能提高，我们不能有丝毫忽视这方面的建设。而且小、土的也是一个过渡的形式，必须不断提高。有人说：既然是过渡的，大搞就不必要。不，我们看什么事情都应该采取辩证的观点，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因此，某个时期的某种形态都

是过渡的，小、土形式也不例外。小、土形式是目前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既然是必需的，那就是正常的，而且为了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工业，这种形式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量采用。

当前小、土、群的问题，是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在一些部门中是普及，在另一些部门中是提高，凡是已经开展小、土、群运动的部门如钢铁机械、煤炭等是如何提高的问题，凡是没有或正在开展小、土、群运动的部门如铜、铝、电、油、铁路、公路、造林、伐木等等企业，是如何普及的问题。普及的问题首先又是思想问题，只要把那些认为他那个部门不可以搞小、土、群的迷信思想打破，运动就会很快发展起来。钢铁工业原是认为较复杂、较高级的企业，尚且可以搞小、土、群运动，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小、土、群逐步由普及向提高发展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从小到大，从土到洋是必然的。我们要看到这种发展规律，不要让事物停留在低级阶段，必须促使它向高级阶段发展。譬如钢铁工业，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小、土、群从普及的阶段推进到提高的阶段。这就要着手在铁矿和煤炭资源丰富的地方，有意识地选择一些重点墟群，在它的附近，建立小铁矿，小煤窑，并和小、土、群的交通运输结合起来，组织固定的采矿、运输、冶炼的专业队伍，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进行各种技术改革和工具改革，逐步提高它的技术装备和机械化程度，建立小型的轧钢厂和综合利用煤炭的小型化工厂。以便使它们向着小型的，土洋结合的钢铁联合基地发展。

工业方面的群众运动，除了小、土、群这一条腿外，还有大、洋、群这一条腿。大、洋、群实际上是大型现代化企业管理上的一次革命运动。我们大型的现代化企业，不能说过去没有群众运动，但是比较起来，这方面的工作是薄弱的。与其说是大洋群，毋宁说是大、洋、专多些，一些大型的现代化企业的干部，常常看到设备的力量、书本上的经验，只习惯于靠规章制度，靠命令办事，而看不到群众的力量，总害怕群众发动起来了，会打乱生产的秩序。这就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企业的潜力。因此，群众运动就是企业里的群众路线对专家路线的革命。

在大型企业里怎样把职工群众发动起来，把群众运动搞深搞透呢？各地已经创造了一套好的经验，这就是“两参”（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规章制度）“三结合”（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结合）。这些经验是有

普遍意义的。我們知道人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要解放生产力，就要解放人，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那就要对过了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实行革命。生产关系三要素，除了所有制、分配制的改变之外，主要是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的革命。在大型现代化企业里面，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一是企业的领导骨干与科室之间的关系、科室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三是反映和规定着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的各种规章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要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使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达到真正的平等，从而把群众发动起来。“两参”是解决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可以打掉干部的官架子，促使干部靠深入的以身作则来工作，而不是靠命令工作；加以工人参加管理，这就大大发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领导者和工人群众的平等关系的发展。“三结合”是解决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在党的领导之

下，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企业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密切结合，这种结合，打破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思想，不仅能够克服互相扯皮，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从而能够解决任何生产上的困难，而且也是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一改”是解决第三方面的问题，因为有些规章制度不是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来制定的，特别是从有利于发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发来制定的，从管人出发，而不是从生产出发；而且有些规章制度，即使过去是合适的，现在却过时了，因此，这些规章制度都应该加以改变，并且还要经常检查这些规章制度，一发现不合理的，就要加以改变。还有“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要加以运用，“四大”是我们整风运动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共产主义民主运动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有了这种方式，群众才敢于畅所欲言，便于开展思想斗争。“四大”是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重要保证。

## 广州市訂出1959年理論宣传工作规划

广州市已訂出的1959年理論宣传工作规划是：以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思想，在1958年全民学习理論，全党办党校的基础上，开展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运动。总的要求是繼續普及，大抓提高，联系实际，大写大講。规划还具体地提出了三个要求和六項指标。要求把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在不断地普及的基础上大抓提高，坚决贯彻执行理論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繼續深入地发动群众，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和思想方法；認真总结大跃进的經驗，把它上升为理論，然后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把它作为党的理論工作的經常任务。关于学习规模，规划要求全市参加学习总人数应达全市人口总数的二分之一左右；迅速建立起工人阶级的理論队伍，要求每个党的支部，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理論队伍；認真总结十年来党的理論工作。（孔）

# 青年学生参加学术思想批判的意义

王 威 宣

目前全国各高等学校青年学生正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群众运动。这是一项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大事。高等学校青年学生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重大意义，表现在下列两方面：

第一、青年学生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就使这一思想批判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受到批判的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失去了市场，使批判进行得又深又透。同时，在破旧的基础上立新，这样才能真正在青年学生中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在高等学校的教学中，更是表现得严重。浸透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教师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都会传播着资产阶级的观点。通过群众性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就有可能在思想领域中来一次大消毒。通过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批判，便使青年学生知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什么货色，它们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和展开这种批判的意义。这样，“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就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战斗作用。这等于在青年学生的思想中注射了一次抗毒疫苗，增强了抗拒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毒害的能力。这样，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就难以找到市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阵地就更加巩固了。

第二、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使青年学生得到再一次思想锻炼的良好机会，培养了新生力量，壮大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队伍。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搏斗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我们要在青年学生中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也应该使他們投身到火热的学术思想批判的实际斗争中去，而不是用单纯闭门读书的办法来培养他们。这样，通过实际的学术思想批判工作，就能够培养一批经得起考验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理论工作队伍。

因此，青年学生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

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这种新生事物应该采取热忱欢迎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贵族老爷式的轻蔑和打击的态度。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把教育工作神秘化，以为只有专家才能办教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委不懂教育’，‘群众不懂教育’，‘学生不能批评先生’那就是错误的。”同时指出这些思想是一种迷信，它只会妨碍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反对。我们应当提倡“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应该表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上，而且也应该表现在学术思想的批判上。

思想领域中若不是插上工人阶级思想的红旗，便是插上资产阶级思想的白旗。学术思想中不可能有“真空地带”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是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也正是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在学术界的反映。从最近所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在充满思想斗争的社会科学中受着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即使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也同样笼罩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乌烟瘴气。面对这种情况，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思想消毒，是非常必要的。青年学生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工作中，由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有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武装，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有人怀疑：青年学生还在学习期间，是否有必要的学术修养和理论水平，来参加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我们认为，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只是一种伪科学，这种伪科学是经不起事实的铁拳一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面前，终归是要原形毕露的。且不說那种用几十年的功夫去研究“楚辞”中“河伯”的妻子、儿子、女儿和女婿的“专家”，即使那些被認為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們也总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不敢正视现实，不敢承认真理，只能歪曲事

实，颠倒黑白。因而他們的所謂“学术”，也是一文不值的。由于階級的特性的限制，他們只能有一副鑽牛角尖的头腦，他們帶着資產階級的偏見来观察問題，就必然得出与客观存在相反的結論。他們采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必然得出前后矛盾和錯誤百出的論断。所以，只要我們用馬克思列宁主义階級分析的分光鏡，就可以揭開他們在形形色色的外衣伪装下的原形来。

第二，青年学生通过整风运动，政治挂帅了，树立了敢想、敢说、敢作的共产主义风格，破除了对資產階級教授的迷信，解放了思想，这就使青年学生具有无穷的智慧和生命力。在过去，有些学生妄自菲薄的思想情緒是相当严重的，他們把資產階級教授看成高不可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人物”。有些人还提出：“这一輩子能够学到某教授的一半學問就心滿意足了。”經過整风运动，青年学生看見了自己的力量，識破了資產階級教授“专家”的本来面目。他們为了捍卫真理，捍卫党和人民的科学事业，已經表现了惊人的智慧。他們已經从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学和其他科学各部門展开了全面的突击。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学术思想的群众运动。目前正在逐步扩大与深化。

第三，青年学生由于年輕，解放以来受了党的教育。一般說来，資產階級学术思想对青年的束縛較少。与青年学生相比，資產階級教授由于受了几十年的剝削階級的思想影响，唯心主义思想就象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他們。这些人虽然經過一定的改造和学习，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与提高，但不少人对于唯心主义还有留恋。况且，由于原来階級地位的限制，往往使他們孤芳自賞，抱殘守缺。正如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自白：“宁愿和爱人离婚，也不愿和唯心主义分裂。”这就充分說明思想意識的改造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任务！青年学生沒有这些包袱，或者有了包袱而勇于与旧思想决裂，因此，他們就可能站到对資產階級学术思想批判的最前列。

第四，青年学生在批判資產階級学术思想时，由于有了党的領導，就能發揮組織和集体的智慧。有了更正确的方向，可以少走弯路；有了集体的智慧，可以集思广益。例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批判資產階級教授拟訂的旧教学大綱，自編新的大綱时，有些資產階級教授說：“你們沒有看过原書怎么可以編大綱？”但是，学生人多，分工負責很快就把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都涉猎一遍了，結果編出了最适用的大綱，有效地發揮这种群众的集

体的智慧，这正是青年学生参加对資產階級学术思想批判的力量的泉源。

尽管我們可以列举許多关于学生可以批判先生的理由，但是那些持有資產階級观点的教授先生們还是不肯心服的。也有些同志，由于受了旧传统的影响，对学生批評先生的新鮮事物觉得不很順眼，因而提出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論。为了扫清学术思想批判中的思想障碍，有必要加以澄清。

有人說，“学生知識少，先生知識多。学生怎么有权利批判先生呢？”是的，一般說来，学生的知識总比先生少些。但是，我們說，知識的多少并不能否定人們参加学术思想批判的权利。我們党的原則是：在学术批評和討論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任何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学术工作者都可以对別人提出批評和受到別人的批評。任何人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評，或者对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熟視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錯誤的。資產階級教授所“多”的知識，有很大一部分是資產階級的貨色，现在这些“知識”有的已經过时了，應該加以批判。退一万步說，一个人的知識的多少，是会起变化的。是不是“权威”，也是会起变化的。今天的权威，明天可以变成非权威；昨天的非权威，今天也可以变成权威。陈伯达同志說得好：“权威經常是从小学生来的。权威和小学生，經常要变化。小学生会变成权威，权威又会变成小学生。当了权威之后，不甘再当小学生，他就将不再是权威了。”（见“在毛澤东同志的旗帜下”，红旗杂志第四期，12頁）这便是馬克思主义者对权威和小学生的辯証法的認識。那些自称为学术界的权威，受不得別人的批評，不甘心做群众的小学生，那就会自甘落后。事实很明显，目前学生批判資產階級教授，有許多內容都是一針見血，打中要害的，如果不認真正視现实，批判自己的錯誤的学术思想，还打算“閉門思过”，或是躲躲閃閃，那就远远赶不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全民大跃进的新形势了。

“学生批評先生，会不会引起先生的內心的不滿，降低他教学的积极性，这样到头来損失的还是学生自己。”有些好心肠的先生們提出疑問来了。这种顧慮是多余的。首先，我們学术思想批判的目的是治病救人的思想改造运动。学术思想批判是解决人民內部的矛盾，批判的对象是資產階級学术思想而不是把有这种思想的人“整”一顿。因此，我們采用“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如果有不同意見还可以提出反批評。学术思想問題和一般思想問題

又还有不尽相同之处。它应该采用丰富的事实根据来说服对方。所以，通过学术思想批判是“烧红”教师，而不是“烧焦”教师。这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因此，教师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一同来参加学生对自己的学术思想批判。通过了彻底的批判，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这样，就有助于今后教学质量的真正提高。如果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让他们原封不动，那才会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贻害青年学生。通过学术思想批判，从思想上锻炼了青年一代，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有了强烈免疫力，便更能够在今后学术思想上紧握无产阶级的红旗。

“学生批评先生的学术思想，能不能以理服人呢？”有的人怀疑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副教授看了学生批判他的学术论文之后，带着轻蔑的口吻说：“革命性还好，科学性差劲”。是不是学生参加批判先生的学术思想真是科学性差劲呢？我们认为不然。象北京大学批判马寅初、冯友兰、王力、贺麟、朱光潜、游国恩、林庚和王瑶等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生动事例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其实，某些资产阶级教授企图用“科学性”的大帽子来吓唬青年学生。我们认为这位自命“科学性”很强的副教授先生，恰恰把“革命性”和“科学性”对立起来了。我们的教育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科学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因而，革命性与科学性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统一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又说：“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1页）这些话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来说，也完全是适合的。青年学生的论文，即或是不够成熟，也应该表示欢迎的态度。推开窗子说亮话，这位教授先生所以要这样说，不正是因为青年学生的学术思想批判打中了他的要害的缘故吗？我们也必须强调指出：我们批判学术思想是以理服人的，而不是机械搬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为思想意识上的问题是不能用表决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进行认真、严肃而又细致的学术思想批判工作，而不是草率从事。我们是不怕争辩的，因为真理在我们这一边。

“这样发动学生来批判先生的学术思想，是不是会在学生中引起轻视老师的思想呢？”有些人又有这样的耽心。太多了！教师的威信应该建立在

教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坚定信念之上，应该建立在教师本身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之上。在今天，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教授无论如何不能成为青年学生的表率。一个教授若要在学生中有崇高的威信，就应该彻底地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旧我决裂，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师表”。我们的党是非常重视建立教师的威信的。列宁早就说过：“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升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教师们所始终不能达到的高度上。这乃是无待证明的真理。”但是要到达这点，就必须有个先决条件——教师的思想改造。所以列宁紧接着又强调指出：“我们为了这点，就必须有系统的、一往直前的工作，既要提高教师的精神状态，也要使他们拥有各方面的修养，以期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的称呼。”（“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1001页）今天的学术思想批判工作，正是使教师提高修养，“以期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呼”的做法。有人说，教师与学生，到底是“谁说了算数”，“谁服从谁”呢？我们认为这个提法有毛病。我们主张服从真理！谁掌握了真理，就应该服从谁。西方的哲学家不是很早就说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名言吗？这句话在旧社会是很难做到的。今天，我们给了这句名言以新的生命力，使它重新恢复了思想的光辉！

当然，如果因为谁的学术思想被批判因而就藐视他，不去进一步在政治上团结教育他，也是不对的。应该知道，对于资产阶级的一些专家，只要他们接受改造，我们还应该好好团结他们。他们某些知识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即使错误的思想，也还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认清它使我们增加抵御错误思想的能力。

由于群众性的学术思想批判工作还是一项新的革命工作，同时，又是一项细致的思想工作。有些青年学生由于知识水平和经验的限制，个别所做的还没有达到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尽善尽美。有些学术思想批判的论文，还写得比较粗糙。然而，应该知道，初生的果实往往总还带有些涩味和酸味，但是靠了党的阳光的照射，必然会使这些果实结得又硕大又美味。每一个真正的好教师都应该满腔热情地去迎接它，并且从这个新生的果实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养料。让我们全体教师和青年学生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取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伟大胜利，使我国学术思想界真正进入“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繁荣昌盛。

# 我們怎样做工人学哲学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曹平凡

当工人群众已經普遍組織起来学习哲学的时候，如何巩固和提高这个学习运动？这是实践向我们提出的一个新問題。在普及方面，我們已經积累了一些基本經驗，但是在提高方面，还是經驗不多。因此，正确地解决这个問題，就能够使工人群众的理論学习，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

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条成功經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無論做什么工作、凡是用“两条腿走路”的，就会取得輝煌成績，相反，如果是“一条腿走路”，工作就做不好。理論工作的“两条腿走路”，就是普及与提高同时并举。这一点，毛主席早就作了明确指示：“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往往有人片面地理解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前一个时期，因为有人不适当地強調了哲学是高級的思想体系，結果把它束之高閣，形成少数人在那里关門提高的冷冷清清的局。当工人群众破除了对哲学的迷信而紛紛組織学习之后，又有人说：工人学哲学應該先普及后提高，他們不理解“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的道理。实际上，普及不可能老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普及工作若沒有提高做指导，那么全民学理論的热潮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形成。不从对立統一的辯証观点去認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实际中就会把普及与提高的工作截然分开。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的普及与提高，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我們在組織工人学哲学时，深切地感觉到这两者之間不可分割性。中一烟厂工人学哲学的发展情况，很可以說明这个問題。該厂在成立第一个哲学小組时，就有工人提出“誰当講師”的問題。他們要求学

习，希望学到一些东西，因此也就提出輔導的要求。在上級党委宣传部的协助下，哲学学习就展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全厂工人都参加了学习。于是，第一个哲学小組就在这种形势下一变而为輔導組，每一个組員都是各个学习小組的輔導員，有些人还当了講師，經常向工人作輔導报告，不仅在厂內講，也到厂外講；不仅給工人講，还給高等学校的师生講。象这样的从工人到學員、輔導員、講師的过程，既是个普及过程，也是逐步提高的过程。

提高的标准是什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工人思想觉悟有无提高，生产有无跃进；再一个是看工人階級理論队伍的成長。这是个方向問題。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从階級斗争和生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科学，当它被劳动群众掌握之后，就会显示出它改造世界的威力。因此，判断工人学哲学有无提高，是否掌握了学习过的理論，不是看他讀了多少本書，能否說一套，而是看他实践的过程中，能否运用哲学原理去观察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解决生产中的实际矛盾。正因为这样，我們特別強調从实际出发学习哲学，不是按照書本去学，而是做什么学什么，边学边用，使理論学习成为改造思想、推动生产的重要武器，因而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中一烟厂第二車間生产組長周树泉，学习了矛盾普遍性的道理之后，就积极采取措施，帮助糾正小組關不团結的现象，从而消除了成见，加强团結，促进了生产，使一向不能完成生产任务的第五号机台，在八月二十三日就超額完成了八月份的生产任务。許多工人学习过毛主席的著作“矛盾論”之后，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他們認識了客观規律，在生产上更加敢想敢干，充分發揮



主观能动作用，战胜种种困难，推动生产发展。新中国机器厂修理車間老工人官生的学习心得，集中地反映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在生产上碰到一些困难，只知埋怨行政领导不好，比如我車間只有三个技工，我就认为人少不能搞好生产，只知伸手向上要人。学习哲学之后，我明白目前劳动力紧张是生产大跃进所出现的新矛盾，不但不再埋怨领导，而且敢想敢干，改进技术，大力培养新学徒，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技术力量不足的矛盾。”哲学武装了新中国机器厂的工人，他们在生产任务繁重，原料缺乏，劳动力不足等困难面前，以革命干劲和智慧克服各种困难，大力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改进机器性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有可能从机械車間节省一百多个劳动力支援炼钢，护送钢铁机械两大元帅同时升帐；多次获炼钢流动红旗，創造一套轉爐連續出鋼102爐的纪录；提前三个月超额1.75%完成全年生产计划，使去年总产值比前年翻了三番。在大搞土簡群运动中，該厂又是一馬当先，創造惊人成績，仅在去年11月16日至12月10日这段時間內，就創造了土簡机床一千二百七十一台（件），大大改变企业设备不足和设备落后的面貌。学习哲学还帮助人們改善了相互关系，加强了协作，广州玻璃厂的工人，过去在生产上常鬧别扭，上下工序不够配合，分配任务时，大家都爭着要好机器，爭做容易的活，他們学习过两种宇宙观之后，知道看問題要从全面出发，树立了整体观念，克服了本位主义，搞好团結，互相主动支援，共同研究解决生产关键問題。象这样的例子很多，工人学了理論就能运用，就更加加深对理論的認識，这是最实际的提高，是我們所需要的提高。如果学得一大堆名詞概念，会說一大套原理法則，却不能指导实践，那是教条主义的提高，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提高。

南区工人学哲学的运动，发展很快。去年六月，只有中一烟厂14个职工成立了一个哲学小組，到现在，全区参加学习的人数已扩展到近十万人，占区屬总人口的38.7%，其中工人就有四万四千三百九十二人，占全区工人总数的95%。在哲学学习大普及的同时，我們又大抓提高，积极訓練学习骨干，建立工人阶级的理論队伍，现在全区拥有三千七百二十名工人輔導員，二百六十七名工人講師，并且成立了广州市第一个工人群众的学术团体——南区工人哲学研究会；还建立一支由干部組成的約五百人的兼职理論教員队伍。有了这支队伍，就能够在全区范围内广泛开展学习輔導活动。与此同时，工

人群众的写作运动也大力开展起来，成立了五百多个工人写作小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內，工人写出的专题論文就有七千七百二十三篇，学习心得六万七千八百二十一篇，經驗总结一千二百篇，至于民歌、大字报就更加不計其数。在这大量的文章中，我們已經看到不少质量較好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如中一烟厂杨庆写的“我們是这样学习哲学的”小冊子和“論取消計件工資”、戴培照写的“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等文章，都受到群众好評。工人說：写一篇文章，等于进行一次复习，帮助自己总结学习心得，对理論的領会也就更深刻。从这些数字和情况中可以看到，不仅工人阶级的理論队伍正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成长，这些参加理論学习的劳动人民的理論水平也正在逐步提高。

在巩固和提高工人学哲学的工作中，我們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在書記挂帅、全党动手、充分走群众路线的前提下，积极做好下面几件工作：

第一，加强思想指导。一切工作都要政治挂帅，沒有正确的思想做基础，是很难保证学习得好的。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各級党組織都不放松思想领导，不仅在开始組織学习时要大破迷信思想，在学习开始以后，也要密切关心学员的思想变化。为了帮助工人群众把学习热情坚持下去，各单位抓住务虚會議的形式，經常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每当一个单元学习結束时，便召开务虚會議，彼此交談学习心得，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检查学习态度，让大家及时看到成績，增强信心。中一烟厂第一哲学小組成立以来，先后开过十次座談会，这样就能及时克服松劲情緒，調动群众的学习积极性，又能交流学习心得和經驗，互相提高。

第二，保证学习时间，健全学习制度。在大跃进的年头，各方面的工作都很繁重，如果学习时间不加以保证，学习就会时断时續。有鉴于此，区委曾經作了明确规定：工厂企业单位在不妨碍生产和不影响职工休息的原则下，每周政治学习时间不得少于二小时。各单位党組織遵照区委这一指示，全面地安排生产、會議、学习、休息等时间，一般是通过紅专学校的組織形式，把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统一起来，保证了哲学学习时间。在固定的学习时间以外，許多单位还善于結合日常生产活动和會議进行哲学学习。在学习組織形式上，也是从生产需要出发，采取哲学小組、紅专学校等多种形式。

第三，正确贯彻党的理論教育方針，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做法上，我們根据实践——理

論——实践的公式，采取从实际出发，先談生产（工作）中的問題，然后用毛主席的思想，对这些問題进行分析，得出結論，再回到生产（工作）中去指导实践。就是說，通过大鳴大放大辯論，以哲学为武器进行分析，解决实践上的問題，并且通过再实践，使工人群众进一步加深对理論的認識。在強調从实际出发的同时，还要提倡多讀書，一般是經過鳴放提出問題之后，由輔導員介紹閱讀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和党的有关文件，然后組織爭論。这样的一种学习方法，是南区工人学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它的好处是：（1）能够启发群众的学习积极性，使他們經常提出自己迫切需要解决的生产上和思想上的实际問題，从而有的放矢地去学习理論，扭轉过去那种“先生講、学生听”的一套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2）从实际到理論，工人就更容易掌握抽象的哲学原理，并用以指导日常的階級斗争和生产斗争，使哲学学习真正成为提高思想、推动生产的武器，因而也就更能提高工人的学习兴趣。許多工人最初抱着試試看的心理参加学习。后来嚐到了哲学的甜头，信心就坚定了。正如中一烟厂女工胡珍所說：“由于学习能联系思想和生产实际，解决问题，现在就是赶我也不愿离开哲学小組了。”

第四，大力培养工人理論队伍，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輔導活动。这是普及工作本身所要求的，也是提高的有效方法。如果没有一支坚强的群众理論队伍，是不能适应全民学理論这个新形势的，而群众性的輔導活动的开展，又能在輔導过程中逐步提高。在去年八月中旬推广中一烟厂的学习經驗时，我們就抓紧时机，开办輔導員訓練班，为各厂訓練大批学习骨干；各单位也随着工人学哲学的深入发展，相繼建立輔導組，一些基础較好的单位还成立工人講師团。我們在普及工人学哲学的时候，手上沒有现成的教学力量，而是依靠自力更生，根据能者为师的精神，实行干部与群众相結合的办法，从群众中挑选学习骨干，加上一些基层干部，成立了各种理論宣传队伍（輔導班、教研組、講師团等），在党的领导下，到群众中去做輔導工作。許多单位党的負責干部都参加了这个队伍，并經常向职工做联系实际的理論輔導报告。

毛主席說过：“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間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經過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这个原則，为了帮助干部和群众中的骨干提高理論水平，我們通过下面几种

方式进行培养和訓練理論队伍：

1.以区委党校为陣地，开办理論班，吸收各单位的学习輔導員和宣传干部参加学习，帮助他們懂得怎样运用哲学原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懂得运用理論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去輔導工人学哲学。同时，还配合各个时期的学习内容，举办专题講座。在学习毛主席的三本哲学著作时，先后組織了五次介紹“矛盾論”和“实践論”的专题講演，帮助大家更好領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在学习人民日报有关文件时，又組織过三次共产主义講座。此外，我們还特別組織过一次“怎样做輔導員”的业务講座，由中一烟厂的輔導員介紹他們的輔導經驗。

2.各厂普遍建立輔導組，把学习骨干本身的学习与向群众进行学习輔導結合起来，做法是：集中群众鳴放的問題，先經輔導組学习，把問題辯深辯透，然后分散到群众中去輔導。如果需要向群众作輔導报告，也是經過輔導組集体討論之后，指定专人輪流負責給群众講哲学課。象这样依靠集体研究和在实践中培养的方法，可以較快地提高輔導員的理論水平。

3.成立南区哲学研究会，它的任务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澤东思想的指导下，結合当前生产、工作、思想等实际問題，运用实践——理論——实践的学习方法，进行专题哲学研究，并通过會員宣传馬列主义、毛澤东思想，和指导广大职工的哲学学习，以提高工人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通过这个工人群众的学术团体，进一步把分散在各厂（店）的学习积极分子团結起来，从而更好发挥群众做理論宣传的作用。我們曾經組織过一些會員到各厂去巡回講学，并且組織过两次全区性的大型学术报告会，由中一烟厂杨庆、胡珍和新中国机器厂黄旭、黄垣分別作了关于“取消計件工資”、“論紙老虎”、“大搞土簡群”、“学习哲学解放思想”等报告，这些活动大大地鼓舞了工人学习哲学的积极性，他們看到自己的階級弟兄上合作报告，感到特別亲切生动，許多人听完报告后紛紛写大字报鳴放，要求經常举行这样的报告会。除了学术报告之外，哲学研究会还經常发动會員写論文和学习心得，不断地巩固学习成績。

我們在巩固提高工人学哲学方面，所做的工作还很不够，特别是在培养工人階級理論队伍方面，还需要作很大努力。今年，要在繼續普及的同时，大抓提高，准备建立一支千人的工人講師队伍，写作万篇哲学論文，争取实现理論工作的更大跃进。

# 評“美是什么？”

温 莎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3日刊载了吕荧的“美是什么”。文章分三部分，除了第三部分有关一些历史和文字学的问题，我没有做过详细研究，因此不能发言外，对于其余两部分，我以为值得探讨。

“美是什么”，问题首先这样提，很好。我也认为，必须解决美是什么这样的标准的问题，然后才能考察自然、社会、艺术等现象是美的或不美的问题。就象先得知道“沸点”是摄氏100度，然后才能科学地判断水开不开的问题一样。

“美是典型”。这样的答案，的确错了。因为事物中有丑的典型，我同意吕荧的说法和例证。

“美是物的属性”。不知这“属性”指的是物的自然属性，还是物的社会属性？如果指的是前者，把“美”和物理上的“属性”等同，那当然错了；如果指的是后者，那是还值得研究的。吕荧提出有的物（如鳐鱼、猴子、恶霸地主）没有美的属性，从而论断“美是物的属性”错了，这逻辑欠通。是的，某一部分物“没有美的属性”可以推翻“美是一切物的属性”的论点，却不能推翻“美是物的属性”的论点。其实，很容易明白，一般说美是物的属性，其意是指美的物具有一种美的属性；不美的物，当然不具有这种美的属性。吕荧硬把美是物的属性和美是“一切物都具有的一种性质”（这等于说一切物皆美——恐怕只有疯子才这样说）两者的意义划上等号，这是曲解的。例如，白色是物的颜色，但却不是一切物的颜色。其实，吕荧举出鳐鱼、猴子、恶霸地主没有美的属性，恰恰依赖于有的物具有美的属性的肯定的前提下，因为，假如根本否定了“美是物的属性”的话，那么，某些物（包括鳐鱼、猴子、恶霸地主）就无所谓有，或者没有美的属性的问题了。

“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的，吕荧说得对，这仅说到美的认识，没有说到美的实质。但是，从唯物论的观点看，假如“统一”就是“一致”的话，那么，在这样的美的认识过程里，却肯定了人的美的观念是客观存在着的“美”的反映。换句话说，就是同意“美”首先在于客观。否则，

主观就无所谓与客观一致不一致的问题了。当然，以美的认识来作为美的实质的答案是不确切的。至于从唯心主义或二元论来理解，那就更错了。

那么吕荧是怎样回答“美是什么”——这样的美的实质的问题呢？

他说：“美是人的社会意识。”

假若吕荧明白表示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那么，就不会发生什么难于解决的争论。但是吕荧在文章中，却似乎表示是采用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的。这样，他的这个答案就值得商榷了。

吕荧一面说美是第二性现象，一面又说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可是又没有指出“美”——这一社会意识究竟是什么社会存在的反映。以致这样的“美”（意识），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吕荧从列宁的“哲学笔记”里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话，排斥了美的自然科学观点，从而得出美“不能离开人的客观存在看待”，而“只能作为人们的属性而存在”的论点。在此处，他同意了美的客观性，但“人们的属性”却不是“社会存在”，因为他认为美是“社会意识”，这倒真令人无从索解了。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他似乎是肯定的。但他说的：“美是社会意识”。为是，“社会生活”又不是“社会存在”而是“社会意识”了。这是相当离奇的逻辑：这逻辑导致“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等同。

是的，吕荧马上补充进车氏这段话：“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从而，他论断了“美是通过生活概念被人认识的。”

吕荧虽然在混乱的逻辑里翻筋斗，终于显出他的唯心主义美学观点的实质来了。

首先，他忘了车氏这段话，是在“美是生活”这唯物论的前提下说的，此其一。其次，车氏在另一个地方谈到这点时，“我们的……”三字是加了重点的（见车氏“美学论文选”中译本29页），也就是说，指的是“我们的”人生观的生活，而非“他们的”人生观的生活。因为，只有我们的生活

概念，才是客观社会生活的正确反映。而吕荧，他不是以作为客观的社会生活所存在着的美的基准来衡量事物，倒是以美作为社会意识来衡量事物。这点错误，可举一个相同的例子。列·斯特洛维奇在“论现实的审美的特性”一文里，曾指出1955年苏联高等教育部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基本原理”教学大纲草案中写着这样公式：“美就是现实现象对美学理想的吻合”。斯氏批评这是“对审美特性作了主观主义的理解”，并说：“且不谈这公式的逻辑方面——美是通过美学的东西来决定的；这里已经断定在不是由美学理想所丰富的现实本身中美是不存在的。”（“美学与文艺问题论文集”52页）这批评，对吕荧也是适用的。斯氏在同文中，恰恰也指出有人引用车氏这段话来否认美的客观性；同时也指出车氏这话的不彻底性，即它并没有说出：“什么样的美的理想才应当认为是真实的。”（同上书50页）

吕荧的主要错误在哪里呢？

我以为，吕荧的错误在于把“美”和“美的观点”、“美学”等概念混为一谈。

由于社会现象中的确存在着不同阶级的不同的美的观点，和不同的美学，所以，吕荧就把“美”归结为社会意识。这也许就是他所谓凭着事实来解释理论的根据吧。我们承认这样的事实，而且也认为任何美的观点、美学，作为社会意识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但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对立的美的观点和美学这一事实，却提供给我们那一种才是对客观存在作了正确的反映的问题。吕荧恰恰不重视这个问题。其所以不重视反映上这一真伪的问题，正根源于他把美定义为“人的意识”。所以也就必然派生出美既是这个阶级的人的意识，也是那个阶级的人的意识的理解。我的看法与他相反。我认为，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如果说无产阶级的美的意识是客观社会生活的美的正确反映，那么，资产阶级的美的意识就是对客观生活中的美作了歪曲的反映。如同科学与宗教一样，如果科学是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那么宗教就是客观世界的歪曲反映。如是，就有一个前提必须肯定，那就是：客观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美”。客观的“美”随着社会生活而发展着，所以正确反映着美的美的观念（意识）也发展着。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来理解美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

吕荧举了许多历史生活上的例证，说明了美的意识的发展，却不承认客观生活中有美在发展。就以狩猎生活的原始民族来说吧。他们的美的观念，

难道不是反映了首先在他们的生活中动物本身具备了某些美的特质，而并非他们的美的意识投射在动物身上的么？

我们说，社会主义、劳动……的思想是美的意识，资产阶级却说，资本主义、剥削……的思想是美的意识。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分明是对立的。那么，谁的才正确？什么是标准呢？既然以辩证唯物论的历史观点来考察，那么凡是解放着生产力，把历史推向前进的任何社会生活便具有美的特性。符合这种特性的人的意识便是真正的美的观点。所以，社会主义、劳动……的思想，便是美的意识，而资产阶级的美的意识，却是“伪品”，对于我们来说——对于真正的美的客观标准来说，正相反，它却是丑的意识。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的丑，而非美。

吕荧说，美，决不是不通过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这些社会意识来认识。这话当然对，因为整个客观世界都得通过这些社会意识来认识，何况乎美？但这并不能否定了世界是客观存在着；同样，也不能否定美是客观存在着。当我们说“天”、“地”、“社会”、“人物”这些概念时，它们也是人的意识，但我们不能就否定了在我们意识之外首先存在着天、地、社会、人物。所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按：指真的科学，而非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也不过是客观的自然和社会的特质规律，经过体系化了而正确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否则，它又何以称为观念形态？对于美学，也何曾不是如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来说，它又何曾不也是在客观的社会生活里的事物的美的特性和规律，而经体系化了反映在美学家的头脑中呢？可是，假如没有这些客观的规律存在，这些社会意识，又从何而生？我对美学的理解，便是建筑于这样的哲学基础上的。

我的意见到此为止。归纳一下，在吕荧的文章里，以下的这些命题都是作为他的正面论点而出现的：

- 一、美是社会意识。
- 二、美是生活。
- 三、美，这一社会意识，同时也是客观存在。
- 四、但社会意识又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我确实在这几个命题之间无法找到说得通的逻辑联系。对“客观存在”和“社会存在”这两个概念，我不知他是怎样区别理解的？由于论点的矛盾和混乱，他所举的历史和文学学上的例子，便无所附丽了。因此，他对“美是什么”的答案，是难于令人首肯的。

# 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

燕 丘

## 个别与一般概念底一般意义

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反映客观世界规律底个性与一般性,即客观规律底特殊性与普遍性以及二者之间底联系和不断互相转化原理底哲学范畴。这里讲的一般性普遍性或共性是同一概念,指的是各种门类事物内部底统一性乃至世界终板的统一性。这里讲的特殊性,不是仅指某个种类所屬事物共同具有的特殊性,主要的是指各个单一事物独有的特殊性即个性。所以个别与一般或特殊性与普遍性,就是个性与共性。

研究了内容与形式和本質与现象两组范畴,再来研究个别与一般这组对立范畴,可以就内容与形式和本質与现象底关系作个对比与联系的研究,以便深入一步理解客观规律底个性与共性或特殊性与普遍性底認識的来源,和二者之间底辩证的关系。在本質与现象范畴研究中,我們理解由现象到本質底認識,即是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亦即由生动直观到抽象思维底認識。复杂的现象,不但在它們所屬种和类底共同的本質上统一起来,而且在世界终板的共性或一般性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即世界底物質性与物質运动所绝对服从底一般规律。人們底感官,不能接触到事物底本質的一般性或普遍性,人們之所以有可能認識事物底本質或一般的规律,是历代优秀的科学家哲学家,从无数次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底具体实践中,对个别事物特定本質(个性)認識底积累,进行科学的概括与提炼而来的。本質与现象范畴,最基本的目的就在于反映客观事物底本質,帮助人們获得这种認識。而内容与形式,是人們不断在实践中,具体研究具体事物,从新認識单一规律的特殊性或个性,从而不断丰富并提高一般性或普遍性规律認識底逻辑范畴。所以,个别与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这组对偶范畴,是表现内容与形式和本質与现象这两组范畴之间底辩证的关系,亦即客观规律底个性与一般性

之间底辩证的关系底哲学范畴。

现在就个别与一般两个概念底一般意义,分别論述如次。

什么是个别事物底个性或特殊性呢?

前面已指明,我們这里所講的特殊性,是指现象世界一切单一的具体事物特定的本質或个性;即“矛盾論”所揭示的“矛盾的特殊性”。毛主席說:“成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質的區別。只有注意到这点,才有可能區別事物。”这种特殊性是怎样产生,被什么力量规定的呢?毛主席接着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这就是世界上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者叫做根据。”(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机械的矛盾运动,表现为作用与反作用;物質的化学运动,表现为化合与分解;生物有机体底矛盾运动,是新旧細胞体底斗争;阶级社会底矛盾运动,表现为阶级底对立与斗争等等。因为矛盾运动,各有特点,它們底特点,使上述各种运动形式,从本質上互相区别。这种特殊性,就各种类运动形式說是特殊的、具体的,但就每个种类中所屬多数单一的具体事物說,却是一般的。因为每一种类的特殊性中只包括着它所統屬的每个单一事物底普遍性或共性,舍弃了各个个体千差万别的具体特殊性或个性;因此,以种类为单位的特殊性,对一种类所屬多数单一的具体事物說,它还只是一般性或共性,人們在实践中,固然應該認識客观事物各种类之间本質的區別,認識一个种类其所以不同于其他种类底特殊性,这样,也就認識了一个种类統屬下多数单一一个体底一般性或共性。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更重要的則是把握“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即当前問題底具体情况——单一事物独特的矛盾統一体底个性,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当前个别事物“特殊的本質”,正确

地解决具体問題。

現象間底普遍联系与矛盾对立统一的斗争，是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底特殊性或个性，不在于現象間是否有联系，是否存在矛盾斗争，而在于什么与什么联系，什么与什么相矛盾斗争。怎样的具体条件下具体地进行斗争？矛盾运动底具体情况，其所以各个特殊，世界上其所以决没有两个具体事物底性质完全相同，而存在着无限多样性性质的差别，就是由于具体的联系与主客观条件的特性所规定的。因此，任何客观个别事物都有它自己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所构成的特有的本质——具体的矛盾运动。人們底認識与实践万千难处都在对当前事物具体矛盾底个性的具体分析与正确把握，所以毛主席說：“成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点。”列宁則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为馬克思主义底本质与活的灵魂。

革命导师們其所以这样強調对事物特殊性或个性的正确認識，因为这是具体实践成敗的关键。客观事物独立在人們底意識之外，它底运动变化不依賴人們底思想意識，更不会迁就人們底主观愿望，不管人們意識它或不意識它，也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事物总是按照客观规律运动着，人們要进行实践，不管是革命或生产，要不遭受損失，只有使自己正确的認識当前事物底具体情况，求得主观与客观一致，必須这样，才能使自己底思想——解决某一具体問題的具体的計劃、設施方案（特定规律的具体表现）等等，有充分的客观根据，必須这样，才是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方法，才能符合客观要求，正确地指导具体实践。

具体情况，既是各个特殊，处理具体問題，决不可能有一套到处通用的现成方案。凡原理原則与实际經驗，都只能作为实践时的指导与参考材料，从而認識当前具体事物底个性——特殊的规律，不能用它們代替处理具体問題底特殊性规律；如果用一般原理原則代替具体的特殊规律，就犯了教条主义錯誤，用經驗中某些局部知識代替一般原理或事过境迁的客观特殊规律，就犯了經驗主义的錯誤。教条主义与經驗主义其所以必須反对，就是因为对具体情况說来，它們都是主观的、片面的，不能反映当前具体事物底特殊性或个性，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錯誤方法。

正确掌握当前具体事物底具体情况，基本地在把握它底“特殊的本质”，即每一具体事物內容深处最本质的內核。

可是具体情况各有特点，不可能有两处是完全

相同的，怎能容許半点主观片面的思想呢？这种具体情况的正确把握，是实践成功底关键和保証。难处就在这种特殊性或个性底正确把握。列宁、毛主席其所以那么強調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原因就在这里。

内容与形式范畴是反映事物个性，把握单一特殊规律的邏輯法則，在認識与实践底意义上都是同样重要的。

現在我們再来研究一般性或普遍性。

前面已說明，客观世界规律底一般性或普遍性，就是現象界內部的統一性，共同的本質或一般的规律。这概念底实际內容是唯物辯証法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諸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由量到质底变化发展，发展过程通过否定之否定以体现不断地新旧交替，逐級上升的发展。这些规律既隱藏在現象界內部，不能凭人們底感官接触，人們对一般规律的認識，就不得不从无数具体事物認識底积累中，經過科学的概括与抽象而获得的。

現象界变化发展底必然性都为它們內部共同的本質所制約，就支配运动底意义上講，本質就是规律。唯物辯証法諸基本规律，是一切种类的事物所必須服从，也是客观世界終极的統一性，或共同的本質。事物和过程变化发展底方向，和每一过程最后的结果其所以是绝对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就是因为被共同的本質或一般的规律所制約。比如世界整个资本主义必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凡新事物必孕育着否定自身的因素而終被否定，为更新更高级的事物或新的阶段所代替，如此等等。因此，客观世界规律底一般性、必然性和绝对性三者都是属于本質的规定性。从本質底意义上理解了这种规定性，我們就知道凡共同的本質所规定的发展方向与前途，一定是一般的，必然的，绝对的。

现代一切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哲学，从实証主义、实用主义到邏輯实証論、語义論等等，它們底共同点就是只承認直观和感觉所及的領域，否認科学的抽象，否認客观世界一般规律的存在和認識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它們害怕揭露社会現象后面的本質，和历史发展无可改变的方向以及它們階級必然灭亡的命运，所以千方百計地企图把客观世界底一般性和本質掩盖起来。

## 个别与一般底联系与互相轉化

人們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地对新事物底个性

——独特本質或規律的認識，是客觀世界一般性規律認識發展底唯一的源泉。

個別與一般或特殊性與普遍性底聯系和互相轉化問題，可以分兩方面來研究。客觀世界帶有一定特性的個別的具体事物，是和它們所屬種類底一般性或普遍性乃至世界終極的一般性或普遍性聯系着；就是說，每一個別事物內部都包含着一般性或普遍性，一般性或普遍性也只能凭個別的具体事物而存在，所以，一般性、普遍性或共性只能存在于個別事物底特殊性或個性中。同時凡現實存在的具体事物，都是特殊的有個性的，它們底存在又都是暫時的，相對的，凡現實存在的具体事物，當它完結自己發展過程，而從現實中退去的時候，如果是通過所屬種類本質的變化，它原有的一般性和個性都將消失，而從舊事物統一體中解放出來的新生命（在社會發展中則是新的生產關係，新的思想意識），就轉化為另一種新事物，在新的一般性中發展新的個性。比如由資本主義的各種企業轉化為社會主義的各種企業等等。世界其所以有不斷地新陳代謝和發展，就是由於個別與一般或特殊性與普遍性底這樣的聯系，與二者不斷互相轉化底結果。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上述這種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即人們底認識由個別到一般或由特殊到普遍，再由一般到個別，或由普遍到特殊的發展。這就是說，人們底認識過程底發展，是由具体實踐開始的，在實踐中，對個別事物底個性或特殊性規律獲得新的認識；人們所累積的這種認識資料，經過科學的抽象和概括，才達到對事物共同的本質或一般性規律的認識。而一般性規律的無限的發展與提高是永遠依靠新事物特殊性或個性底認識來補充和豐富的。這便是由個別到一般或由特殊性到普遍性底認識發展過程，也是由具体到抽象，由現象到本質，由生動直觀（感性認識）到抽象思維（理性認識）底認識發展過程。然後，再用這種已被認識或更提高了一般性或普遍性規律作指導，對當前正待解決的新問題，即新的具体事物進行具體的分析與研究，以認識新的個別的特殊規律，正確地指導具体實踐，這便是再由一般到個別或由普遍到特殊。個別與一般，就是這樣不斷互相轉化，不斷互相提高以推進歷史發展，提高人們底認識。

我們再來研究上述客觀世界運動發展情況，怎樣反映於人們頭腦中，即人們底認識，怎樣由個別到一般或由特殊到普遍，以及二者怎樣互相轉化，以不斷提高並發展人們底認識的問題。

毛主席說：“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的特殊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一般的事物，指多數個別事物內在的一般性，即下述“共同的本質”。引者注）。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矛盾論”）。

怎樣理解毛主席所提示的這個原理呢？

舊社會里，這裡的佃農貧雇農苦於壓迫剝削，那裡的佃農貧雇農一年辛苦不能維持一家最低的生活，各地農民都在不同的情況下，同樣受地主壓迫剝削又同樣與地主對立鬥爭，這種現象，儘管具體情況多麼不同，但當我們將這許多現象匯集起來，進行分析和綜合，我們就可從這許多個別現象中概括出它們內在的統一性，揭露出它們底共性，即農民與地主階級矛盾對立這一共同的本質。地主壓迫農民，農民因而反抗地主等具體事實都是這個或那個個別的社会現象。在舊社會一般情況里，這類現象後面隱藏的統一性和必然性才是它們共同的本質。我們如果研究了本質與現象這組範疇，對這種由現象到本質由特殊到普遍，由個性到共性由偶然到必然的運動過程與規律就更容易明確理解。

前面已指明，人們的感覺所能接觸到的，只有客觀世界個別的具体現象，眾多現象後面底內在的統一性——共同的本質是只有通過科學的概括與提煉，才能把握到。所以從個別到一般或從特殊到普遍性，由個性到共性的認識過程，也就是由具体到抽象或由現象到本質，由偶然到必然的認識過程。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區別，就是個別與一般的區別，就是現象與本質的區別，就是偶然與必然的區別。從這裡更可以領會到：個別現象特殊規律的認識與具体實踐的經驗，其所以不能作為一般原理，就是因為它是個別的、特殊的，只能作為當前一定具体實踐的理論根據，而不能完全適用於另一具体事物（任何具体事物都有自己底特性），所以只有把握了現象界內在的統一性——共同的本質的聯系，才是把握到了客觀世界運動發展的一般性規律，才能作為普遍適用的一般原理原則。

如上述農民與地主對立的具体情況，各個特殊，但在眾多的個別現象中，存在着的統一性——共同的本質，就是農民與地主階級底矛盾，這是問題底本質。人們認識了這個本質問題，就掌握了徹底解決這種矛盾的一般規律，那就是組織農民向地主階級進行徹底的全面的鬥爭，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以解放農民。這便是已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的一般

性原理了。人們掌握了這個原理以後，不論在哪个这样的具体問題的解決上，就知道只有从階級底矛盾与斗争出发，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引出解决具体問題的特殊性規律（即具体进行斗争的方法）以貫徹这种一般原理，解决具体問題。这是認識过程，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底情况。

由此可见，这样由多数具体现象中，抽象概括出的一般性規律，已不象任何个别經驗底內容那么狹小，那么片面，而是全面地，統一地反映了現象界內部的联系——本質或規律，只有这样把握了事物底本質，才能作为指导具体实践解决新問題的一般原理原則。所以，毛主席說：“当着人們已經認識了这种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这种共同的認識为指导，繼續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即指具体实践——引者注），找出其特殊的本質，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認識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認識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認識不断地深化。”（“矛盾論”）

由此可见，由一般到特殊，就是用已經知道的道理作为研究新的、还没有認識其个性的事物的指导的原理原則。不掌握既知的科学原理，是无法正确認識新事物个性和特点的。而既知原理，也全靠新的个性的从新認識来不断地丰富和补充的。

客观世界底运动发展过程是无限的。这无限过程是以无量数的个别具体事物底有限过程底新陈代谢从時間空間两方面統一地联系着的。作用于无限过程中的一般性規律，是一切有限过程所具有的一般性所絕對服从的統一性和必然性，如唯物辯証法所反映的客观世界諸基本規律、范畴，是无往而不存在，无往而不起作用的，所以是絕對的。当然，这絕對只是从它們存在和作用底普遍性意义上講，絕不是从認識底深度与发展底进程上講——对空間認識底深度，与時間发展底进程來說，都是无限的；因此，人类对真理的認識底可能性与现实性也是无限的，永远不能达到最后的絕對的終点。只能在認識每一个別有限事物底个性或特殊性連續的无限进展与深化中，无数次由个别到一般的相互轉化的过程中步步深入地丰富客观真理——一般規律底認識。

人們面前现实存在的一切具体事物，在无限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有限的，暫时的，相对的，特殊的，而客观世界底一般性或普遍性，不能抽象存在，只存在于一切个别的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具体事物中。正如无限必須不断通过有限过程的連續而体现一样，必然性必須凭偶然性形式，絕對性必須以相对形式以体现自己。这些对立范畴是这样互相联系着的。因此，只要理解了个别与一般，或特殊与普遍底辯証的关系，也就能够从而理解相对与絕對，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具体与抽象底辯証的关系。

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其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因为它是反映了自然界（广义的）底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学。繼承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而产生，且歷經考驗的毛澤东思想，他底哲学体系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一脉相承的光輝发展，所以毛澤东哲学思想本身同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李达教授所著“矛盾論解說”却說“由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澤东思想，是由一般到特殊”（李著“矛盾論解說”頁十三）。这种說法是把毛澤东思想和它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旧中国社会底特殊性，看成一回事，把根据一般哲学原理原則結合中国各种具体条件为解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而写作的“新民主主义論”等著作以及各种策略方案等等，和毛澤东哲学思想本身看成一回事了。这是不符合实际，而又模糊了特殊与普遍底辯証的关系。难道能够說“实践論”“矛盾論”等哲学論著，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只适用于中国的特殊环境嗎？我們以为只能說，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中国革命底具体实践，产生了毛澤东思想，这是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直接的发展。

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問題，李达教授又曾提出：“矛盾的特殊性，被包攝于矛盾的普遍性之中”（李著“矛盾論解說”頁二），我們也觉得頗难理解。“普遍寓于特殊”，以及二者不断互相轉化的理論，已将普遍与特殊，或一般与个别底关系說尽了，再来个“特殊被包攝于普遍之中”是什么意思呢？客观規律底普遍性，原是从众多的个别事物底特殊性或个性底积累中，經過科学的概括与提炼而来的。所有非本質的特点和一切感性素材，都被舍弃掉了，只保留了它們底特殊性中的共性的或本質方面的东西。因此不能說“特殊性被包攝于普遍性中”。因为凡包攝了特殊性的普遍性，只能是



个具体事物，就是特殊性自己。比如說，桃子包攝于水果中，这包攝了桃子的具体的水果，只能是某个具体的桃子自己，不是水果底一般，包攝了特殊性的普遍性，还算什么普遍性呢？

由此可见，“一般者”中“含有特殊者的丰富内容”不是指别的，乃是指“特殊者的丰富内容”中底本质、本性的东西，亦即我們前面所說从众多个别事物中概括与提炼而来的一般性或共性。因此“特殊包攝于普遍中”云云，是值得考虑的。

正确理解个别与一般，或特殊性与普遍性底辯証的关系，对于認識与实践，該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所以毛主席于指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之后着重說：“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辯証法。”（“矛盾論”）为什么对个性共性相互关系的理解，意义这么重大呢？就是因为这是辯証唯物主义与各色唯心主义（包括形而上学）对客观世界底認識上的基本分歧点之一，与什么是第一性，什么是第二性的問題，几乎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唯心主义者，不是根本否認客观事物底共性与本质的存在和認識的可能性（主观唯心主义者都是这样的），就是把客观世界底共性或一般性，看成是独立存在于客观世界之外的“先天理念”或“绝对精神”，它的运动发展，不但不依靠一切个别具体事物底个性的不断从新認識作根据，从而不断的提高与丰富，而是相反，所有个别单一事物的出现与存在，都是“先天理念”或“绝对精神”这个一般者在自我运动中的“外化”或“异在”。一切客观唯心主义者都是这样的。因此象黑格尔这样的大师，由于他是唯心主义者，所以在这共性与个性，或个别与一般底关系問題上，他的辯証法就无能为力了。而形而上学家，即使不是将二者分割开来，也不能正确解释二者底关系。只有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第一次正确地揭露了二者唯物辯証的关系。假如我們不深刻理解二者关系底辯証原理，当考察实际問題时，就有陷入了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錯誤而不自知的危险。所以毛主席把这个問題称为“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辯証法”。

### “普遍寓于特殊”和这一原理底实践意义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

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矛盾論”）

不能形而上学地将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这个构成任何具体事物的二重性，割裂开来，我們必須切实理解“普遍寓于特殊”“无个性即无共性”的原理。

关于“普遍寓于特殊”的一般原理和二者的相互关系，我們已从上面的研究中获得某些理解了，現在我們进一步考察一般性、普遍性或共性与特殊性或个性，在每一具体事物中到底是怎样具体地互相結合，怎样起作用的問題。二者是平行并列地存在，独立自由地各起作用，还是互相渗透，渾同一体地起作用呢？关于这个問題，阿历山大罗夫的解释是正确的：“唯物辯証法的普遍规律之表现在事物中，并不是和該事物特有的规律并列的，也不是不顧及这些规律，而是表现在这些规律本身中。……例如在物理学中，辯証法规律并不是不顧及物理规律，也不是和它并列，而是表现在它本身中，表现在物理规律中。在其他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是如此。在这些规律中，普遍的规律——辯証法规律，只是表现在各該现象所固有的特殊规律中。”（阿历山大罗夫主編：“辯証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版，頁五四）

由此可见，普遍性存在于每一具体事物底个性中，是通过各个具体事物固有的特殊性而起作用的。这是因为任何特殊事物，必須服从对立统一的斗争，斗争发展过程底质量变化，现象間的依存联系等基本规律，这些基本规律，是普遍的绝对的，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包含着这些普遍性，这些普遍性在具体事物固有的特性中起作用，表现在什么与什么相对立，什么与什么相依存联系，怎样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用什么形式斗争以及矛盾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条件的具体情况等具体事实上。斗争与联系是普遍的绝对的，什么与什么斗争，什么与什么联系，以及矛盾力量与条件底具体情况等等总是各有特点，表现具体事物规律的特殊性。就靠这种特殊性，以体现规律的普遍性。这种具体情况，是不可能有两个事物完全相同的。普遍性就是这样存在并作用于特殊性之中的。

矛盾底生长方面和衰亡方面底对立斗争，生长方面必然战胜衰亡落后方面，这是不成問題的一般原理。掌握一般原理，就是为了指导具体实践，在具体事物中体现一般性原理。按照具体对象底特点和个性，引出它特有的规律，指导它怎样为自己創

造一切有利条件，怎样发挥高度主观能动作用，就是使它体现一般原理，战胜衰亡落后力量，获得顺利发展的保证。

## 結 語

现实存在的事物，都是个别的、特殊的、有个性的。客观存在的一般性，普遍性或共性，是无数个别事物底个性的概括与科学的抽象。所以，一般性，即现象界内部的统一性，共同的本質——物质及其运动的规律。因此，必须掌握一般性，才能知道怎样研究个别具体事物底个性或特殊性。认识个别事物特有的本質——个性，才知道一般性怎样具体存在并作用于个别事物的个性中，并怎样用具体的方法解决具体问题。

认识底运动发展，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这个发展过程，即是由具体实践，到一般原理原则的认识，再用一般原理原则，指导具体实践，认识新的问题，发现新的原理。实践与理论，

就是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不断地相互提高。

人们底感觉所能接触的，都是个别的、具体事物。一切个别的、东西不但必须与一般的东西联系，而且客观世界底一般性或共性，只存在于一切个别的、具体事物底个性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一般性其所以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和作用，就时间空间说，都是普遍的、无限的，所以是绝对的。客观世界底本質及其规律性的被认识，就其深度和广度说，都是无限的。这无限认识发展过程，依靠每一有限的个别具体事物个性的新认识来不断补充与丰富。理解个别与一般底辩证的关系，理解“普遍寓于特殊”“无个性即无共性”的原理，对我们认识客观世界进而具体地改造客观世界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在个别的、具体事物中，理解个别与一般的具体联系，从而正确认识具体事物底个性——特定的规律性，并怎样具体运用这种特定的规律以体现一般原理。

###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派出工作组

## 进行人民公社调查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根据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计划编写若干本适合于人民公社基层干部阅读的通俗读物，要求联系实际并从理论上阐述党对人民公社的各方面的政策问题。具体内容初步计划包括下列几方面：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两个过渡问题；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问题；人民公社的工业化问题；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问题；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问题；人民公社的财货管理问题；

在人民公社展开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等等。

在进行上述各问题的研究和编写工作的时候，该所采取全所各研究室组大协作的方式和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最近除了派出一些同志参加省委组织的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检查团之外，还组了两个工作组分别到韶关市樟市人民公社和新会县环城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些工作组，将于春节前结束调查工作，从二月下旬开始陆续完成通俗读物的编写工作，并定于三月底以前全部完成。

# 批判罗克汀的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哲学

章 良 潮

右派分子罗克汀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散播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观点。特别在他的自然科学观和哲学史的领域内，大量地散布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而大家都知道，罗克汀却厚颜无耻地吹嘘他是华南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权威。因此，完全有必要就他自吹的“拿手好戏”特别是有关自然科学观方面的谬论，进行严肃的批判。

罗克汀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常用的手法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他空洞地搬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却阉割它的革命的精神实质。拿经典作家的、苏联专家的正确词句，来掩盖自己的观点。批判罗克汀的谬论，必须揭开他的外衣，揭示他的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

罗克汀自认为自然辩证法的权威，写过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问题的著作。然而，即使罗克汀如何地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马脚”，但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自然科学与实际、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唯物唯心观点的根本区别等三个问题上，就充分显露了这位“权威”对自然科学原来只是一知半解，混充内行。他在他的所谓论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著作中，披着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词句外衣，实质上在贩卖一系列的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观点。

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罗克汀的修正主义谬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仅仅是科学的方法论。他说：“科学发展的行程从‘搜集阶段’走向‘整理阶段’，这时，科学提供给人們以一个任务，按照着这些科学素材底内在的联系而去将它们组织成为理论之系统。而要整理素材，首先就必须有科学方法论——思想方法论。”（自然辩证法之基本问题第七页）因此，在他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变成了“贯通于一切科学之中的思想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33页），而绝不是其它。这

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明确的阶级性和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作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及其对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伟大指导作用，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中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就被罗克汀轻轻地抛在一边了。

其实只要具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会了解，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也就体现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对于科学的思想领导。要吗，就是无产阶级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科学；要吗，就是资产阶级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科学。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着。

正是由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以其巨大的真理性及生命力，指导和引导着科学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的作用，仅仅归结为“整理作用”或“思想方法”的作用，那就在实质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

罗克汀的这一连串错误，与他的所谓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另一错误观点是分不开的。据他看来：“哲学与科学是都彼此独立了，谁也不从属于谁。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不可分离地统一着。”（自然辩证法之基本问题，第7页）

对立的，但又不可分离地统一着，罗克汀在这里玩弄着辩证法的词句，然而，他的所谓统一，却是这样的统一：“哲学没有了科学便失去了基石和内容，科学离开了哲学便没有了指导者和启发者。”如上所述，哲学对科学的指导和启发，在罗克汀只意味着“整理作用”，“思想方法”，而科学对哲学则是基石和内容。——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没有了自己的科学内容，而必须依靠其他科学。这就是罗克汀所谓“科学和哲学都彼此独立，谁也不从属谁”的秘密。

在这里，罗克汀俨然是振振有词，有根有据

的。他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一段話來為自己辯護。恩格斯的那段話是這樣說的：“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說來都是辯證的，而再不需要任何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這樣從全部以前的哲學中，還保存獨立意義的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科學——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屬於自然的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之中了。”羅克汀由此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是方法論，與科學分家了，彼此對立着。他抽空了哲學的科學內容，把它還原成簡單的方法論，成為空洞的形式，哲學的基石和內容，必須依賴於其他科學。照他的解釋看來，科學沒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可以的，頂多發生一些“整理”的困難，而哲學沒有了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則只有嗚呼哀哉，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就會喪失其基石及內容。

然而，羅克汀根本沒有讀懂恩格斯的話。恩格斯並不會把辯證唯物主義變成了單純的方法，他只是說：古典哲學經過批判、改造後，剩下來的是思想方法論。羅克汀歪曲了恩格斯，由此達到他的哲學科學對立、哲學依賴於科學、哲學對科學只起方法的作用的荒謬結論。

這樣，羅克汀就把馬克思哲學描繪為沒有科學內容的，純粹形式的，遠離實際的東西，因而借此來抹殺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科學的指導作用的巨大意義。

正由於羅克汀的“哲學”是空洞的思維形式，因此，由此出發的羅克汀的自然科學觀也只能是空洞無物的。在羅克汀筆下的自然科學，不是有血有肉、有根有蒂的社會產物，而是脫離社會現實的。

在他的著作中，雖然也談到自然科學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問題，但卻從來不打算正面的具體的接觸這一問題。相反的，在他的著作中精神的暗流是：自然科學與當前現實，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分离。

正因為這樣，所以他才說：“我們說：‘勇於改革客觀事物適應人類進步要求’；這就是說，科學是打破偶像的，科學從不停留於任何一個地方，它經常用新的學說，新的理論，新的原則，以適應新的生活，適應於人類進步的要求。”（自然辯證法之基本問題，15頁）。

羅克汀的偷天換日手法是巧妙的。他要宣傳科學脫離實踐，但卻抬出了“科學改革客觀事物”的招牌。其實，科學如何通過實踐去改革客觀事物，他並不感到興趣，他有興趣的，只是科學經常出現新的理論等等而已。而這個，也就是羅克汀的“改

革客觀事物”。

這樣，羅克汀就輕易地把“改革客觀事物”的命題，偷換成“改革理論”的命題，這就是全部秘密的所在。至於真正的改革客觀事物，科學如何與改革客觀事物的革命行動相聯繫的問題，就被一筆勾銷了。

對於羅克汀來說，原是有他的“哲學”根源的。因為他一則認為自然科學並不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不需要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的指導，二則認為在認識論上，認識過程的矛盾，僅限於“舊理論與新材料”之間的矛盾（辯證唯物主義與自然科學35頁），而不認為主要的、是主觀與客觀的矛盾。這樣儘管羅克汀口頭上也談到社會需要，談到階級背景；可是由於他在根本上只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現實的關係，理解為純粹的主觀關係，理解為自然科學之本身的理論的提出的問題，理解為理論與材料的關係問題，因而，也就使得自然科學從根本上脫離了與客觀的聯繫，使得他的什麼社會需要、階級背景等等，變成了廢話。因為誰也不可能找到，當我們的認識只是主觀的認識，我們的改革只是限於理論的改革的時候，自然科學將用什麼辦法和方式去和社會實現發生關係，如何去為無產階級服務。

因此，如果說羅克汀在哲學和科學關係的問題上，割斷了兩者之間的主要聯繫，那末，同樣，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的關係的問題上，也割斷了兩者的主要聯繫。因此，我們說，羅克汀的自然科學觀，是脫離政治，脫離無產階級思想領導，脫離社會現實的。這樣的自然科學觀不是別的，正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絕對不相容的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的自然科學觀。

羅克汀對自然科學的觀點，表面上是裝扮成唯物觀點的。仿佛他在那裡竭力反對著自然科學中的唯心論，反對康德，反對馬赫、阿芬那留斯等等。然而，這一些東西，並不是羅克汀自己的東西，而只是直接從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搬來的。

其實，羅克汀在自然科學的領域內，什麼是唯心主義，什麼是唯物主義，也沒有弄清楚。——弄不清楚的原因，不在於他水平的高低，而在於他根本就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證明的那樣。

現在，我們僅就時間及愛因斯坦的運動觀問題上來談談。

羅克汀說：“從過去現在以至未來，就整體上說，時間的發展是只有一個向前方向的。不過，事物的发展是一個近於螺旋綫的過程，而不是直綫式

的。因此在整体上說来，虽然是向前发展，但在个别形态上說，也可能有某种程度上的向后性或复归性，因此，辯証唯物論也承認時間发展方向在某种情形下的多样性，不过，这只有相对的意义。”（自然辯証法之基本問題，23頁）。这是罗克汀的彻底的謊言。辯証唯物主义并不承認時間的向后性，而只是唯心主义的罗克汀才承認它。

罗克汀在这里把時間和具体事物的变化混为一談，同时又把过程的螺旋形式理解为向后或复归。

首先，辯証唯物主义的确承認辯証的螺旋式的循环，但螺旋式的循环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发展。罗克汀在这里把辯証循环还原为机械的循环論。

其次，辯証唯物主义的确也承認事物的一些退步傾向。但是，無論怎樣的退步，只是事物的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問題，在時間的順序來說，仍然是退步阶段发生于旧阶段之后，時間仍然是向前运动的。

罗克汀的根本錯誤在于：他把時間这一物質存在及运动的形式，简单地还原为事物的具体变化，更在于：他把爱因斯坦的時空相对性的理解絕對化了，因而把時間作了唯心主义的理解。这样的時間观，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論中，就給予了明确的批判：“照杜林先生說，時間仅仅通过变化而存在，而不是变化存在于時間之中，并通过時間而存在。正是因为時間是和变化不同的，并且是离变化而独立的，所以時間可以用变化来計量，因为在計量时总是需要一种与所計量之物不同的东西。再說，在其行进中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的時間，并非不是時間，而且它还是純粹的，沒有被任何外界混合物所混淆的時空，所以是真正的時間，作如是观的時空。”（反杜林論，三联版，53頁）

罗克汀的時空观，是比杜林更为蹩脚的。

对于运动与靜止的問題，罗克汀說：“特别是爱因斯坦底相对論的出現，打破了存在于运动和靜止之間的絕對的、固定的界限，而宣布了运动是存在于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推移底統一的状态当中。……因此，在“相对通論”中，爱因斯坦这样地写道：“……运动之概念，本屬相对，在吾人所引以为喻之軌岸及火車，則其运动，可有两种說法，皆为正确者：（甲）車較軌岸为动；（乙）軌岸較車为动。（甲）用軌岸为引体，（乙）用車为引体。如目的只在規定或纪录运动，則用何者为引体，实无分別。……凡有引体KK，等，不問其运动状态如何，皆可用以纪录自然。”据罗克汀的解說，这是符合辯証唯物主义的运动观的。——这又

是由头到尾的捏造。

辯証唯物主义承認靜止的相对性，却从来没有承認运动的相对性。辯証唯物主义認為，运动是絕對的，宇宙間沒有不运动的东西；自然科学的一切成果也証明了这一命題的正确性。辯証唯物主义所承認的，只是运动的具体形式的相对性，亦即运动的轉化問題。爱因斯坦說：“运动本屬相对”的命題，是相对主义的命題，与辯証唯物主义并不符合。

爱因斯坦在后段所談及的火車軌岸之喻，则是从測量运动出发，达到了混淆动静的結果，所以他会从这个观点引出唯心的荒謬的結論：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說和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說都是正确的。这就足以說明爱因斯坦在这个問題上，仍然是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的。把辯証法和相对主义混为一談，这就是罗克汀的折衷主义的拿手好戏。

罗克汀对于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唯心主义的投降，并不止此，他在“自然哲学概論”中还会歌頌过蒲朗克的否定因果的观点。由此可见罗克汀的所謂“自然辯証法”，其实不过是一些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貨色而已。

正因为罗克汀的哲学观点，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因此，在哲学史的領域中，也同样表现了他对唯心主义的尊崇，对唯物主义的厌恶，以及企图在对古典哲学的估价及馬克思主义哲学对前人优秀成果的繼承問題上販賣修正主义的貨色。

在他的哲学著作“思想起源与思想方法”“哲学浅释”等書中，一次再次地說：哲学唯心主义也有“合理的根据”，它“反映了客观真实”，是馬克思主义的辯証唯物主义的“准备因素”。他对于唯心主义的宣扬，更露骨地表现在他对黑格尔哲学的估价上，他一方面称黑格尔哲学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驅”，同时又在“哲学浅释”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辯护；說什么黑格尔是进步的哲学派別之一，因之，他的辯証法头脚倒置之目的，是“企图避过统治者的耳目”。

然而，如所周知，在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完全錯誤的，它不可能有什么“合理的根据”，因为它完全錯乱地顛倒了物質和精神的關係。哲学唯心主义也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即使由于哲学唯心主义不能真正脫离了客观现实而有所反映的話，那末，第一，这种反映是經過唯心的歪曲反映；第二，或者是由于不自觉的，

或猜測到了真實，這其實只是出現于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中的某些唯物因素。把唯心主義說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準備因素”更是荒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確吸收了一切前人的正確成果，包括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中的“合理的內核”——辯證法。然而，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吸收前人的成果，是在正確的、唯物的、辯證的原則下吸收的。在吸收的過程中，還必須經過徹底的根本的改造。唯心主義哲學決不可能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準備因素”，而只能是不可調和的對立物。

正是由於羅克汀的唯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哲學觀點，所以他才那樣地表示他對於古典唯物主義哲學家的貶抑，所以才在他的大多數的著作中，不惜夸大缺點，用了比“批判”唯心主義哲學更多的篇幅，來批判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和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原理。

也正是由於羅克汀的唯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哲學觀點，所以他才會說出：“馬克思主義底哲學成了全人類思想認識傳統的繼承人。”（哲學淺釋）這句簡單的話，清楚地表明了羅克汀完全離開了階級分析的观点，混淆了、取消了哲學史上的唯物唯心的界綫，而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說成是繼承各種不同的哲學流派（所謂“全人類”）的“雜拌”。

也正是由於羅克汀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了修正主義、折衷主義的理解，他才會認為在古希臘的哲學中，有着“自發的辯證唯物主義”。這樣，他就把作為無產階級的進步世界觀的、作為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武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古希臘哲學的某些朴素唯物觀點及辯證法因素混同起來。這樣他就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現，是哲學思想的根本革命，閹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性和戰鬥性，把它還原為一般的所謂思辨哲學。

## “廣東歷史資料”創刊號出版

“廣東歷史資料”創刊號於本月一日出版。

這一期，在現代史方面，發表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海豐全縣工農兵代表大會”所出版的“會場特刊”和“彭湃同志年表”。前者是一件頗有價值的資料，生動鮮明地顯示了大會的狀況。後者比較系統地記述了彭湃同志的生平，為進一步研究他的革命活動和思想提供了某些材料和線索。

在近代史方面，他發表了兩篇有關辛亥革命的回憶錄。篇幅雖然不多，還提供了某些具有參考價值的史料。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遂溪人民抗法鬥爭是廣東近代史中的一個重要事件，這裡刊載的調查報告和有關資料輯錄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事件過程。此外，有關一八九七至一八九九年樂東縣多港黎族人民起義的調查報告則簡要地記述了黎族人民的英勇鬥爭。

在考古發掘方面，本期發表了一篇報導性質的簡記。

#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問題的討論

## 广州学术界座談资产阶级法权問題綜述

本刊編輯部

广州經濟学会筹备会与本刊編輯部于1958年11月30日、12月17日曾先后联合举行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問題的座談会三次（第三次座談会改为書面发言）。参加座談的有广州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高等院校、教授、业务机关負責人。座談会先后討論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核心和主要特征問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具体表現問題；如何正确对待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問題。对这些問題的发言，部分已在本刊发表。从三次座談的情况看来，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核心和主要特征問題，分歧意見較多，其余問題，还只有少数同志发表意見。我們认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問題的討論，正是为了正确理解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具体表現和正确对待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以便为我国加速建設社会主义和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思想上扫清道路，我們首先从概念上弄清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核心和主要特征的問題，其意义也是为了使这些問題解决得更好；因此，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具体表現問題和如何正确对待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問題，还有必要繼續展开討論。今后虽不再就上述問題举行座談，本刊仍将繼續发表有关上述問題的文章。

为了便于繼續展开討論，我們特先把座談会上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核心和主要特征問題的意見（包括書面发言）綜述如下：

### 要不要区别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核心和主要特征？

有些同志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核心和主要特征基本上是一个东西，沒有必要加以区别，并把这一問題籠統地表述为：生产資料的私有制。

有些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見。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核心和主要特征固然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有区别。在探討問題的时候，加以区别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正确理解资产阶级法权产生的基础，抓住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明确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特征，才能够正确理解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具体表現，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采取正确的态度。而作为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生和形成是有它的特定的基础，有它的核心和圍繞着这个核心旋轉的主要特征的。这里要解决的不仅是概念的問題，而且是問題的实质。

###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核心和主要特征？

#### （一）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問題

比較一致的意見，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资产阶级法权既然是被提升为法律的资产阶级的意志，它的基础自然是资产阶级的經濟制度，即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一点正是资产阶级法权与封建阶级法权的根本区别。如果一般地表述为生产資料私有制，就必然要在核心和主要特征問題上混淆资产阶级的与封建阶级的界限。

#### （二）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問題

对这个問題的看法也是比較一致的。大多数同志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性”。资产阶级的一切法律条文，都是圍繞着这个核心旋轉的。

只有少数同志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級制度。

#### （三）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特征問題

关于主要特征问题，座谈会中的意见有较大的分歧。基本上有五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既从理论上否认资产阶级法权主要特征中的等级制度，也从社会实践中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的存在。他们认为等级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与资产阶级是“不相容”的，个别同志并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能并容的”这段话作为自己的论据。因此，他们就把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特征表述为：

“虚伪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或：“只承认形式上的平等，但不承认事实上的平等，就在于承认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平等权利’；或：“在自由平等虚伪性的幌子掩盖下，维护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自由权利”等等。

第二种意见与第一种意见相反，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特征就是等级制度。他们认为等级不过是阶级的“化身”，因此，一切阶级社会都有等级制，而资产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仅仅是封建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的“简单化”而已，也有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比起封建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仅仅是“披上了一层‘自由平等’的外衣”。

第三种意见，一方面从理论上否定资产阶级法权主要特征中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又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中充斥着等级的现象，承认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各种等级制残余的存在。因此，他们认为这些等级现象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是封建主义社会的残余，是资产阶级利用封建阶级法权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的结果。根据这种论点，他们把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特征表述为：以占有财富的多寡为决定因素，同时在“自由平等”的伪装下表现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不平等现象。

第四种意见，认为把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特征说成等级制度，是过于笼统，也不确切。因为等级制度既然是所有的阶级社会都存在，以等级制度来表述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也就不能抓住资产阶级法权的特殊的外部表现，更不能通过这个外部表现，再深入到它的内部，揭示它的实质，揭示它的外部表现同内部实质的矛盾。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特征应该是：以虚伪的、作为所谓“自由契约”、“等价交换”原则所反映的“自由平等”为旗帜，掩盖着阶级压迫和剥削、人与人之间之间的不平等。

第五种意见，认为法权关系既然是经济关系的

反映，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既然是多方面的，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也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述。他们既不同意否认资产阶级法权中存在等级制度的特征，也反对把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集中表述为等级制度。因此，认为等级制度仅仅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之一。

根据上述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特征的分歧意见，本刊编辑部邀请了一些同志，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对上述五种意见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并考虑了原来五种意见的某些部分提出了第六种意见。

参加这次小型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作为一种事物的特征，往往是表现为多方面的。如列宁在表述帝国主义的特征的时候，就指出它包括五个特征，但作为帝国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却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所以，当我们在表述资产阶级法权特征的时候，也不妨从它的各个特征中找出最主要的特征。而这个主要特征，他们试图把它表述为：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

他们不同意那种完全否认资产阶级法权主要特征中的等级制度的意见。因为一切虚伪的自由平等，或者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不平等，其实质都是一种等级，如果否认了等级的存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就被抽掉了具体的内容；但是，他们也不同意那种把封建阶级的等级制度与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不加区别，或者把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说成仅仅是封建阶级的“简单化”、“披上一层‘自由平等’的外衣”。因为这种意见，并没有从性质上把封建阶级的等级制与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区别开来，至于把等级制这一主要的特征和其他特征平列起来的意见，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意见既不符合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情况，也影响我们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斗争中首先冲击各种等级制残余的主要目的。

那么，把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特征表述为资产阶级的等级制，会不会如第四种意见所说的，“不能通过这个外部表现，再深入到它的内部，揭示它的实质，揭示它的外部表现同内部实质的矛盾”呢？他们的意见是：如果不区别等级制度的阶级属性，而只是笼统地表述为等级制度，或者不从等级制度的内部实质把封建阶级的等级制与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区别开来，而仅仅说成是“简单化”的，或“披上一层‘自由平等’的外衣”的，那当然是不确切的。他们认为既然这种等级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也就从“内容实质”上区别于“封建阶级



的”。因为：第一，它是以占有财富的多寡为决定因素，而不以宗法特权为决定因素；第二，它是以财富的转移而形成其等级的可变性，而不是封建的世代相传；第三，它是在“自由平等”的伪装下的等级关系，而不是赤裸裸的等级关系。

他们还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之所以成为主要的特征，是因为这种等级制关系几乎是无孔不入地表现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表现于社会经济生活、国家政治生活、文化教育权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种族

与种族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而这种等级关系的残余，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还有所表现。这正是我们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清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斗争中首先要冲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等级制残余的客观根据。

以上六种意见，是座谈会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核心和主要特征问题发言中的基本的意见。其他一些与上述意见虽有不同，但并无原则区别的个别意见，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 正确对待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问题

李超桓

### 在我国当前情况下，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具体表现

首先，我国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由此而产生的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具体表现。除了这个表现之外，也还有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意识和行为中的表现。通过了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其他一系列运动（例如干部和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两参一改等），全国人民大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相互关系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人们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则大大地被削弱了。但就在今天，还有许多人不肯放弃私有观念；时时刻刻还在为个人利益打算；还有许多人斤斤计较劳动的报酬，既不肯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也不肯比别人少拿一分钱；还有人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不用同志式的平等态度对待别人，自己的级别高些，便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官气十足；在知识分子当中，突出的表现就是：名利思想、轻视体力劳动、把科学知识看做是自己私有物，不肯轻易传授给别人，重业务、轻政治，有雇佣观点等等。这些现象也应该说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表现，因为资产阶级法权是维护私有制和自私行为的。人们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残余是不是从按劳分配制度产生出来的呢？有些同志硬把这些思想

残余说成是按劳分配制度的产物。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事实的。私有制和由此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长期以来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私有制虽然被消灭了，但是人们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还有着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这是很自然的。这些思想残余很难说是因为有了按劳分配制度才产生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正因为我们的社会还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人们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就有机会表现出来。如果说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残余和按劳分配制度有什么联系的话，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是如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残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如果不对人们的这些旧观念，旧习惯，旧传统及时地加以批判而任其滋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受到损害。为了消灭人们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残余，就必须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去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和在群众中展开的义务劳动运动，都是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这些运动对于消灭人们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残余，对于树立新的劳动态度，建立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的。

### 如何破除分配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问题

在当前情况下，我国的生产发展水平还是很

低；工农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都還有重大的差別；同時人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也還不高。在這種情況下，採用按勞分配制度是適合的，而且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可迫使剝削階級參加勞動，同時又可利用按勞分配制度中的物質利益原則使人們關心自己的勞動成果，從而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是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按勞分配制度在這一方面的積極作用是應該加以肯定的。但在另一方面，按勞分配制度又必然地會引起人們在分配和消費方面事實上不平等的現象。這種不平等現象是和共產主義相違背的。在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消滅了剝削階級，任何人都只能對社會提供勞動，才能取得生活資料，從這個意義來說，人們彼此之間是平等的。但是這個平等還不是完全的。因為在按勞分配制度下，由於各個人的工作能力不同，家庭支出不同，人們在消費品分配方面事實上還是不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有着這種不平等的現象，當然是個缺陷。但這個缺陷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知道，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出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可避免地要帶着一些舊社會的殘余。也正因为如此，以共產主義的標準看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也就不可能是完善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兩種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社會主義貨幣制度，分配制度中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等，都說明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雖然是基本上同生產力發展相適應，但以共產主義的標準來看，無論在所有制方面，在人們相互關係的方面，在分配關係方面都是不完善的，有缺點的。通過了全民整風和工農業生產大躍進，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時廣大的勞動群眾思想覺悟也大大地提高了。在這種情況下，按勞分配制度的缺點也就越來越顯著；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人民內部矛盾也就越來越突出。人民公社的蓬勃發展以及先進的工人群眾紛紛要求取消計件工資制的事實就說明了這點。那末，生產力和按勞分配制度之間的矛盾怎樣解決呢？我們應怎樣來對待分配制度中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呢？關於這些問題，在黨“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有明確的指示。

“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相當複雜的發展程度，而在这整個過程中，社會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經濟上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

盡所能，按勞分配’；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這只有在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以後才可能實現。沒有這個條件而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妨害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就不利於生產的發展，不利於社會產品的增加，也就不利於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

從這一段指示中，可以知道，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分配的原則都應該是按勞分配的原則。在我國當前條件下，當然還沒有可能而且也不應該把按勞分配的原則整個兒取消；因為它對於生產力的發展還起着積極作用，同時我們的产品也不夠豐富，沒有可能實行按需分配的原則，那末當前生產力和按勞分配制度之間的矛盾是不是可以置之不理呢？是不是可以讓按勞分配中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絲毫不動地保留下去呢？當然不是的。我們必須及時地解決生產力和分配制度之間的矛盾。否則，它就會妨害生產力的發展。那末，怎樣來解決這個矛盾呢？關於這個問題，在“決議”中有明確的指示。“決議”中說：

“在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在社會主義階段上停止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會主義階段而跳入共產主義階段的空想。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認為，……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沒有隔着也不允許隔着萬里長城；我們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發展的階段論者，我們認為不同的發展階段反映事物的質的變化，不應當把這些不同質的階段互相混淆起來”。

從這一段指示中，可以知道，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雖然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但這兩個階段是互相關聯着的。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可以說是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也可以說是共產主義階段的準備階段。在這個階段，跟着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有可能而且也應該逐步地破除按勞分配中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在人民公社的實踐中，就給我們提供了這種過渡形式。這個形式就是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形式，也就是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形式。這種過渡形式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從前面所說，可以知道，在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中保留資產階級法權殘余，並不是要鞏固或發展資產階級法權殘余，而是要利用它來發展勞動生產率，使我們有可能逐步地否定它以至最後地消滅它。這就是我們對分配制度中的資產階級法權殘余應有的認識。

# 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问题的一点意见

龙世雄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问题的争论，首先应该弄清楚三个问题：（1）党和毛主席在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如何运用不断革命的思想的。我认为不断革命的思想，是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又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作准备。就我国情况来看，我们不会在建成社会主义以后，才来一个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同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这不仅包括所有制的改变，例如公私合营企业改变为国营企业，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而且也涉及到消费品的分配制度的改变，今天人民公社所实行的部分供给制和部分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虽然基本上仍是按劳分配，但供给部分已经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萌芽，这种部分供给制，既不同于革命战争时期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2）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等于主张过早地取消“按劳分配”原则。因为只要还存在商品生产，存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就不能取消“按劳分

配”原则。因此，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中，必须正确认识：按劳分配原则虽然不是永恒不变的，但也不能马上取消的。（3）认为把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的作法，是对资产阶级法权让步，并不等于说现行工资制很不好，需要马上取消。

关于怎样正确对待按劳分配原则问题。我有如下的看法：（1）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这个东西。但由于社会主义本身是过渡性质的阶段，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因此，按劳分配本身反映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它的消极作用是要加以批判的；（2）按劳分配制度本身不是等级制，但是它反映等级制的残余；（3）在今天我国社会条件下，按劳分配仍有其积极性，仍起刺激生产的作用，过早地全部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要马上取消这一原则，对生产是不利的，因而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以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要永远巩固它，也是不对的。从有利于逐步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出发，我们要逐步推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 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主要表现

魏双凤

在我国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主要表现有三方面：第一，在思想上表现为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计较个人名誉、地位，要求极端民主化（这方面知识分子表现最突出）；狭隘的本位主义思想，缺乏协作精神（这方面在公社时一些富社的干部和群众表现很突出）；还有轻视体力劳动，享乐腐化，爱慕虚荣等。第二，在经济关系上，表现在社会产品分配上不是“按需分配”而是“按劳分配”，各个劳动者之间因为劳动力强弱不同，从而收入也不同；同等劳动也因家庭负担不同，而生活水平有差别；还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报酬不平等和人民公社社员之间收入不平衡等等。第三，在人们相互关系上：“处处讲正规，事事讲等级”，不是根据工作需要和工作能力来决定一个人的工作，

而是根据“资格”“级别”，类如技术人员不能作科学研究，护士不能诊断治疗，工人不能参加技术设计；上下级之间不是以普通劳动者来互相对待，摆官气、摆架子；家庭关系上的家长制残余，男尊女卑等。这些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主要表现，都是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因此，我们为了消灭这些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必须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实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更多的社会产品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普及高等教育，逐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差别，以及加强共产主义教育，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

# 实行按劳分配符合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律

譚超白

我想談談怎样理解在我国当前分配制度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及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問題。馬克思說过：“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經濟制度以及由此經濟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我国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因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和某些因素，这是不可避免的。

就我国当前的分配制度来看，我国现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采取这种分配形式，是同我国社会經濟制度和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相适应的。但是它还反映着某些不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是资产阶级法权”。不过，在社会主义下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在实践上的作用，已經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法权有本质的区别：首先，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經濟基础已被彻底摧毁，这就大大限制它的作用范围；其次，已抽去它的反动的“剥削剩余价值的内核”，沒有剥削，沒有雇佣劳动，实现了真正的按劳分配。因此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在这里也随着消失了，剩下来的是它的残存躯壳。正如我們仍然利用资本主义經濟范畴内的价值规律，商品生产，貨币流通等交換和分配的手段一样，我們只是利用它的形式而变革它的内容，即把它由资产阶级的剥削工具改变为为社会主义經濟服务的手段，并且利用它，正是为了将来要消灭它。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我們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設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一个晚上就把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残余的东西消灭干淨，这里还需要一段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过程，不然，为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把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初級阶段与高級阶段！关于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还存在着某些不平等，馬克思說：“原则上仍是资产阶级法权”，

这就是指示我們还要不断革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

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既然共产主义是分两个阶段——初級阶段和高級阶段，初級阶段是高級阶段的准备，高級阶段是初級阶段的目的，那末，在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要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創造条件作好准备，各項方針政策和具体措施，都要朝着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这儿不能将两个阶段机械的截然分开，我們尊重唯物論，也要运用辯証法，因此，在建設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方面加快建設的速度，提高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調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根据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思想觉悟的程度，不断改变分配的形式，不仅是可能，并且是必要的。在某些主要产品已达到可以直接分配的程度时，我們是可以采取按需分配的形式来进行分配，但这些只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我們應該促进共产主义因素不断增长，不能因此馬上抛弃“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必須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的时候，才能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原则。很难設想，沒有粮食生产大丰收，就可以在伙食方面采取供給制的分配形式，其他的消費产品也是一样。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还在客观上存在的情况下，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不能一下子消灭，所以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供給制与工资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逐步向按需分配过渡。但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是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这是符合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 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看法

黃家駒

资产阶级法权中的等級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残余。1958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篇“冲破医学科学跃进的障碍——等級

制”的文章，里面写道：“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科学部門中的职銜名目繁多，层次复杂，界限森严。……医疗人員有实习医师、初級住院医师、高級住

院醫師，住院總醫師、主治醫師、分組主治醫師及科主任之分；護理人員有護理員、助理護士、護士之分；教學人員有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之分；研究人員有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之分；技術人員有練習生、技術員、技士、技師、總技師之分。每一級之中有時又分若干小等級。……決定一個人作什麼工作，與其說根據工作需要和本人工作能力和技術水平，不如說根據這個人所屬的等級和“資格”；決定一個人領取多少報酬，與其說以勞動的質量與數量為尺度，還不如說以“學歷”、“學銜”、“學位”為尺度。固然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各種分工，但是象這種“護士沒有資格作治療工作，住院醫師不能作研究工作，技術員總結一種病的治療效果和診斷方法馬上會被教授制止”等等現象（均見上文），也是社會主義分工的結果嗎？顯然這只能說是資產階級法權觀念的反映。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消滅了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制，消滅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從此以後，人們不是以占有生產資料的多寡而是以勞動量的多少來獲取消費品，這與資本主義分配制度比較，就是最大的平等。“按勞分配”、“不勞動者不得食”對於“按生產資料占有”、“不勞而獲”（並且獲得很多）來說是一個革命。不從一定的經濟條件出發，否認“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的歷史作用是不對的。但是也應該承認，實現這種分配原則，還遠遠不能使社會主義制度完全消除社會上實際存在着的的不平等，這種實際的不平等是通過按勞分配也即是承認等價交換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等價交換表面上平等而實際上還是不平等這就是資產階級法權（或者就是法權殘余）的表現，它反映在人們的觀念中就有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如“一分錢一分貨”，“為人民幣奮鬥”，不是政治掛帥而是人民幣掛帥，等級觀念嚴重、官氣十足、架子很大，以及知識私有，把知識當成商品向人民討價還價等等。我們不否認，在實行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下，要徹底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殘余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是困難的，但是近年來有些人卻借口在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下，無法肅清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為理由，而任意讓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泛濫，把“工作者從物質利益上關心勞動成果”神秘化和絕對化了，這難道也是正確的嗎？因此目前開展對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批判，克服實行按勞分配過程中帶來的消極的一面，使按勞分配原則繼續發揮其對生產的積極作用，是十分必

要的。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法權殘余與法權思想主要表現在下面幾方面：第一、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所得到的報酬不同，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得到更高的報酬。華南師範學院有個二級教授寫了一篇論文得到四百元稿費，而幫他审稿的另一個教授的审稿費也有五十元，這難道不是和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相差很大嗎？這種差別的存在就容易滋長爭名爭利，要求升等升級，為人民幣服務，不搞正業搞副業（不上課光寫文章）等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所以最近一些作家和教師提出降低稿費或寫稿作報告不要錢等提議，正是克服這種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好辦法，應該承認，人民給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的物質待遇和他們對人民所付出的勞動，並不是每個人都相稱的，這種情況在大躍進以來更看得清楚。第二，城鄉之間工农之間一定程度的差別和經濟上實際的不平等仍存在着，這就使有些人羨慕和嚮往城市不願在农村，願意搞工業不願意搞農業，這也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表現。第三，複雜勞動和簡單勞動報酬的差別。本來，技術人員是社會培養出來的，他們的才能技術應歸社會所有，但是培養出來的結果却使個人得到好處，有技術的和沒有技術、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在分配個人消費品上都有差別，這就容易使人們思想上產生輕視簡單的體力勞動，不願作平凡的工作，把“侍候人”的工作看作是低下的，以及斤斤計較計件工資，怎樣的級別作怎樣的工作等等，這難道不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反映嗎？第四，體力強弱的差別，也使各人的所得不相等。社會主義制度下，產品還不很豐富，還不能按需分配而只能按勞分配，這就不能不在勞動力強弱不同的人中間存在着個人消費品分配上的不平等。第五，家庭負擔的大小和無家庭負擔之間的差別，也使人們在享受消費品上存在實際的不平等。按勞分配的原則規定了每個人以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來取得產品，這就使小孩和老年人沒有取得產品的權利，而由其家庭來負擔，父母子女多的家庭担子重些，而單身漢的生活就好得多，這次我們到番禺人民公社，看到不少有同樣勞動力的家庭由於人口不同因而生活有差別，有的是超支戶，有的是盈餘戶，年年超支的生產積極性受影響，而盈餘戶由於超支戶借支拿不到應得的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積極性，這次大辦公社，吃飯不要錢，幾千年來養父母育子女的責任由家庭轉給了社會，這樣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這種實際不平等。

我說了上面這些差別並不是說所有這些在今天

都是不合理；当然有些具体措施如稿费、計件工资制、加班加点費等等應該考虑作适应改变是必要的，要來一个平均主义（因为有些人确实有这种倾向），这样作对生产是不利的。我們要承认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來的，因此仍存在着三个差别，产品也不丰富，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存在，因此目前还要实行按劳分配，因而这种反映资产阶级法权特点的实际不平等就是客观存在，随着三个差别逐步消灭，

随着产品日益丰富，也就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现在问题是我們对待这些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應該采取什么态度。按劳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但人們的思想可以是共产主义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建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会反过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和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正是我們现代时代的特征。

## 一点补充修正

### ——关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問題

#### 何 城

在“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問題的一些意見”一文里，我談到了在我国现代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在相互关系方面的表现，并认为存在于这一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根本不为社会主义所需要，因此应当无条件地加以破除。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有加以补充修正的必要。

今天我国在人們的相互关系方面存在的一些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前文所提到的、表现在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中的那些东西，如过分講求正规化，把职务分工绝对化，“事事分等級”等等，确是社会主义所根本不需要而应当加以彻底破除的。但是再加以仔細考虑，就会发现在相互关系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决不止这一些，而还有一些是属于今天还不可能避免，还有积极意义，因而还要保留和利用的东西。

拿分工來說，它固然是今后人类社会所永远需要的，但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那种新的分工（这里对此不能詳加探討），同今天的分工是有所不同的；今天的分工是建立在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之間的差别和体力劳动与腦力劳动之間的差别依然存在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还是带有强制性質的。人們选择职业的自由，不仅受个人劳动能力所限制，而且还必須受社会劳动分工的需要所限制，而后一种限制又是直接带有强制性質的。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某些不平等，也是仍然存在的；消费品分配方面的不平等，正是与这种分工方面的不平等相适应的。

再拿由于职务分工所形成的上下級关系來說，固然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权威与服从的关系，也是人类社会所永远需要的，“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一文就曾引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明过这一点；但是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职能将

失去其政治性質，而变为关注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那时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間、权威与服从之間的关系，也就要“改变自己的形态”，失去它的最后为国家权力所保証的那种强制性質；而在今天，这种强制性質則是存在的、必要的。看来，强制也是永远会有的，但是，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內的这种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强制，固然同资产阶级社会中剝削阶级对被剝削阶级的压迫和强制有根本的区别，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排除了国家权力，而只訴諸社会道德和輿論压力的强制，也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把对待人民敌人的方面和劳动人民同剝削阶级的关系問題抛开不說，只就劳动人民內部而論，这种同国家权力相联系的强制的存在，能否說，就是人們的相互关系上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表现呢？

恩格斯指出过，不仅一般地反对权威，“把权威原則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則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謬的”；而且，在共产主义的初級阶段里“要求一举就把政治国家废除，即要求在那些产生出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当未废除以前就把它废除”，也是錯誤的。这里所說的“产生出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决不止是指对剝削阶级专政的需要方面而言，而是包括劳动人民相互之間还需要依靠国家政权加以調节的关系在內。

总之，我认为，在作为生产关系的一部分的相互关系方面，也同在其他的社会关系方面一样，今天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有些在现阶段是不可避免、还有积极作用、因而还必须加以保留、利用的，另一些則是我們所根本不需要的、只有害处的、因而必須立即加以破除的；对待它們，不能一概而論，而必須进行具体的分析。

（注）文內的引文均見恩格斯：“論权威”。



## 短论与随笔

# 猫 和 花

秦 牧

达尔文举过一个例子，说明自然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他说，在美国不少地方，一个村落猫的多少常常影响田里翘翘收成的丰歉。因为翘翘花需要野蜂给它传播花粉才能够繁殖，但是有一种田鼠专门爱捣毁野蜂的巢，田鼠多了，翘翘收成就不好。但是要是农家多养些猫的话，猫便会去捕捉田鼠，田鼠一减少，野蜂便会增多，翘翘就可以得到较好收成了。

猫和翘翘之间，表面上看来并不相干，而实际上却是存在着这种密切联系的。

自然界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复杂联系，科学家们不知道给我们分析了多少。有一个俄罗斯学者季米里亚捷夫写过一部著作叫做“植物的宇宙作用”，揭示了阳光、空气、土壤、植物、动物这一切东西之间最密切的关联。只有适当的土壤，在太阳照射之下才能生长植物，动物是靠植物生活的（食肉兽，也得靠攫捕食兽为生）。因此这各种东西之间，就构成了密切的关系，生物界和无生物界的相互作用，甚至还扩展到地球范围以外，带有宇宙的性质了。这就是他的那部著作的有趣篇名的来由。

其实，不只是科学家发现了这样一类道理，许多普通劳动者，深入对自然斗争的实践，也是最能够掌握事物间普遍联系的科学原理的。有一位老哲学家告诉我一件轶事：潮汕三十几年前有过一次大海嘯，灾害异常严重，事后许多田地因为老鼠猖獗，收成很差，有些老农特地托人远道买蛇回来放在田里，放蛇的区域，收成果然都好些。原来海水涌上陆地，淹死所有藏在洞窟里的蛇，却未能淹死能够游泳爬坡上树的老鼠，老鼠繁殖是最快的，因此鼠害空前严重。老农们掌握了某些蛇食鼠胃口很大的特点，田里放蛇之后鼠害就较为减少了。在这种场合，某些种类的蛇的存在和收成竟发生了联系，老农掌握了规律，因此敢于大胆地做出放蛇这

样的事情了。

达尔文啦，季米里亚捷夫啦，中国老农啦，他们都说出和做出了妙事。这里面机巧何在？无他，事物间复杂联系的道理给他们掌握到了。因此他们也就成为聪明睿智的人了。

恩格斯曾经把辩证法叫做“关于联系的科学”。联系，各种事物不是互相孤立，而是彼此联系影响的，这道理是辩证法的精髓。因为事物有内部的矛盾，有外部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交互作用，促使事物变化发展，辩证法的各个法则，不过是把这些道理加以分析概括罢了。

一个人联系群众，深入实际，理解大量事物，并洞悉它们之间的关系（用一句中国老话来说，可以叫做事物各种“相克相生”的作用），掌握了这些规律，加以运用，就成为人们通常所形容的“预见者”、“先知者”，能够有科学的预见和英明的判断了。在自然现象的问题上是这样，在社会现象的问题上也是这样。

诸葛亮被中国老百姓世代认为是聪明人的代表，“草船借箭”一事尤其被认为是典型杰作。这一着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无非是诸葛亮掌握了各种事物互相联系的道理，这里面包括了洞察鲁肃的性格（供应船只设备没有问题）、曹操的性格（自恃军力雄厚，骄傲自大）、曹营状况（箭备充足）、天气变化（有一场大雾）等等。这种种理解缺一不可，只有充分掌握了各种有关问题的丰富材料，并且熟知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个摇鹅毛扇的人才成其为特出的聪明者。

作为现代人，先知和预见的例子最使我们振奋和深受教育的，莫过于革命先驱者对历史发展的科学判断了。在一百多年前，当资本主义还声势喧天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說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一百多年后的今

天，东风压倒西风，资本主义制度果然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见完全应验了。在我们这一个世代，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同样是对世界革命具有巨大意义的科学预言。当日本帝国主义正长驱侵入我国的时候，当蒋介石掌握着四百余万军队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当美帝国主义率领着十几个仆从国家，耀武扬威侵略朝鲜的时候，一句话，当天空中满布乌云，不少人正为表面现象而危疑震荡的日子，毛主席却及时作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必将失败的判断。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暴风雨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其后历史的发展一一证实了这些科学的预见。现在，正当美帝国主义还在张牙舞爪做着世界霸王美梦的时候，毛主席又作出了“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的判断，不用说，这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也是要应验的。

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把人民和反动派之间长期的复杂斗争，归结为这样一种因果关系：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方面：“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人民方面：“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在这里，事物的复杂联系用简明的公式表现出来。在那辉煌的文献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这样的道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存在，一定要制造越来越多奋起反抗的革命者，革命者起来斗争，他们就穷凶极恶加以迫害，而这种迫害本身又是最有力量

的反面教育，它使革命者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更加锻炼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循环”不断加剧，最后就招致反动派的崩溃。无论敌人有多少门大炮和多少吨炸弹，都不能摧毁这个公式。而这个为人民掌握的公式的存在，就是一切反动派必然归于灭亡的道理。正象“中子射击”的存在，终必要使一整块铀变成粉碎的道理一样。

毛主席用简明的公式指出了那样一种根本“联系”。而这样一种联系，不是英勇的革命先驱者就不可能充分掌握它。原因是当那个“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而胜利还未呈现的时候，不是英勇的先驱者就不可能感受到革命队伍的无畏气魄。就会被敌人的“捣乱”和人民的“失败”，以至个人的危难弄得忧惧惊惶起来，因而也就不可能洞察那个不变的铁则。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在我们这个斗争复杂，急剧变革的时代，只有伟大的勇士才能够是真正的智者。

洞察事物的各种联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深入实际的研究者才能掌握自然事物的奥秘，英勇的革命先驱者才能掌握历史的规律和具有英明的预见。不论是达尔文从一个个事象的联系中发现了进化论也好，关于猫和花的轶谈也好，毛主席关于纸老虎的论断也好，都启发我们，要真正掌握自然和社会的法则，就得深刻了解各种事物的联系，了解得越广泛越透彻越好。要学习到这一步，就得有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态度，革命家英勇无畏、大公无私的立场。这也就是科学精神和革命精神高度的结合。

## 宇宙火箭与纸老虎

于燕郊

一切客观事物，一经形成起来，就任怎样也抹煞和掩盖不了的，除非客观事物本身发生变化和发展。因此，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仅仅是从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向人们揭示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战斗任务，而对于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来说，则是最致命的一击。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一论断的说服力，还有赖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直觉，即能够眼见耳闻的具体事物，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发展、生产的衰退、文化教育科学事

业的落后，生活方式和道德的堕落，等等。而苏联人造卫星的先于美国上天（且不谈它的重量体积和科学价值的远为优胜），美国人对于绕着太阳运行的苏联宇宙火箭的望尘莫及，这种既引人入胜，又令最狡猾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流无法辩解的具体事物，对于纸老虎是镂心刻骨的痛击，对于上面所说的某些人则是最具说服力的论据。

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开始，每一次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总是要引起世界上最典型的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当然还包括整



个帝国主义陣营)的一陣慌乱、爭吵、不安和莫可奈何的自我解嘲，并不惜工本地希图在这方面冒称为“先驅者”，为已經被戳得体无完肤的紙老虎重新糊上一层金箔；于是乎，不但陆海空軍各部一齐出动，而且用流氓的手法逼迫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師們向宇宙火箭的制造方面拼命，幻想能够在科罗里达州的卡維拉尔角导弹試驗场上創造人类的奇迹。可惜的是这些人类的劊子手，以及那些被劊子手們追逼得热昏了的可怜的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師們，并非創造人类奇迹的人。結果事与愿违——从一九五八年八月到苏联成功地放射了宇宙火箭的前夕，美国的四次月球卫星的放射都惨遭失败：“先驅者”火箭才上升了七十七秒钟，就冒着白烟栽进了大西洋；“先驅者”一号火箭才飞行了十二万八千公里就偏离軌道，在南太平洋上空焚毁；“先驅者”二号火箭发射后四

十五分钟就在中非东部完蛋；“先驅者”三号墜入大气层，不知去向。所有的这些“先驅者”，不但沒有为星条旗挽回已經失去的面子，沒有为华盛顿显示出技术的优势，反而弄得白宫的主人們和五角大楼的將軍們狼狽不堪，而那些奉命来到卡納維拉尔角海岸准备为“奇迹”吹嘘的新聞記者們，那些因接获通知而把射电望远镜对准美国月球卫星方向准备进行观测的天文学家們呢？他們也只好爱莫能助，徒呼負負！

这一来，原想为紙老虎貼金的美国宇宙火箭的試驗，它的屢試屢敗的結果，就成为紙老虎的自我解剖，成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科学論断的最好的注脚，使人們（包括上面所說的某些人）从这里更进一步看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紙老虎的本質。

## 中山大学文科各系教学改革正在深入

中山大学中文、历史、外語三系的教学改革运动是在总结下乡参加生产劳动鍛炼两个多月的收获和經驗，并进一步辯論了党的教育方針的基础上开展的。各系首先就学制、劳动和学习時間安排及专学設置方向展开了辯論。各系党总支提出了“师生并肩作战，芒鋒对准资产階級教育思想和资产階級学术观点”等口号。在这次战斗中，不仅同學們表示了决心，教師們也表现了自觉革命精神，中文系主任商承祚教授，在党总支动員大会上，一馬当先，首先向自己资产階級教育思想开了第一炮，揭露了自己在“說文中之古文考”著作中的剽窃行为；每个任課教师都普遍进行自我检查，历史系杨荣国同志也表示要带头检查。教師們这种自觉的革命精神，受到同學們热烈的欢迎。

从初步检查出来的問題看，比較普遍的問題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历史系中文系表现为忽视历史发展规律，忽视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階級斗争，抹煞人民群众在創造历史和文学中的决

定性的作用，脱离当前的政治斗争。例如在講授文字学和现代汉语中，不但不联系当前文字語言領域的三大政治任务，甚至有人表示反对簡化汉字，认为教拼音方案是低級的事情不是教授所为。有些教师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講課，如在文字学講授中，把文字的來源归結为“不可知”，說研究文字的最好方法是“大胆推論，細心找旁証”，提出用推測的方法来研究甲骨文等等。外語系主要表现在編选教材上，选古不选今，选外不选中，认为“語言越古越典雅”，“中国人写的，不象外文”。在內容方面，片面強調技巧，忽视思想性；所选的词汇，只选文学词汇，不选政治词汇，以致造成学非所用的严重的后果。有的学生到了三四年級，还不知道“总路綫”、“力爭上游”“跃进”等普通外文字汇，看不懂“北京周报”等我国出版的外文刊物。现在各系教学改革运动，正在从进一步批判资产階級学术思想，修訂教学計劃、教学大纲和教材等方面，逐步深入。



## 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一言

合 群

当前，与工农业全面大跃进相适应，我国群众性的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地开展，文化教育战线上，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方面取得辉煌的胜利，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受到了批判。但是，这场教育上的大革命还在不断地深入地进行。这场教育大革命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速自我改造有着重要的意义。

经过一年多的整风运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在政治立场、思想觉悟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和进步；有些人有较大的转变。但是，整风运动还仅仅是政治思想斗争中决定性的一段，还不是斗争的根本胜利。关系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生观、世界观根本改变的教育思想与学术思想，也有待深入进行彻底批判。因此，继续进行政治上特别是学术思想上的斗争，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今后自我改造中的主要任务。

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行教学改革过程中，从政治思想表现和对学术思想批判所采取的态度来看，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当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与当前我国新的形势是很不相称的。虽然，在政治上，他们绝大部分愿意跟着党走，不断要求进步，但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的东西，特别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社会主义的潮流、与无产阶级世界观发生尖锐的矛盾（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具体表现）。所以，加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乃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不能不引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再次分化。要吗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其结果是使得自己与社会主义处于对立状态，为历史所淘汰；要吗不断地改造自己，放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树立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脱胎换骨。二

者必居其一，除此别无出路。想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思想上保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任其发展，必定堕落为右派。过去不少右派分子堕落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场文化教育事业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一、认清客观形势。所谓认清客观的形势，即认清客观世界已经起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自觉地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以符合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

从整风运动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客观世界的变化，一般的是认识不清的，他们看不到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已基本上消灭，三大改造已取得基本胜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是“梁上君子”，因此，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便分辨不清大是大非，并引起了共鸣，欣赏所谓“早春天气”、“教授治校”、“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谬论。有的人本身就发表了不少错误言论；在教育思想与教育观点上，他们坚持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与党提出的教育方针相抵触，与马列主义相对立。

上述一切表现，一方面反映出这些人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没有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人未认清形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使他们对现实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甚至带着阶级偏见来看待周围的事物及其变化。总之，他们只是因为党及时的教育和挽救才与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的。可是，根据整风以来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表现，说明他们并没有完全记取这一教训。整风结束以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飞快地向前发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我国已

掀起文化革命，技術革命的高潮。這種形勢要求進一步改革我國的教育事業，與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學術思想徹底決裂，而有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卻依然故我，或雖有進步，但與形勢的要求，仍不相適應。有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深入教學改革中，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他們怕丟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怕丟名位，怕丟面子，怕“老巢翻底”。他們還沒有認清形勢，自覺改造自己，以適應社會主義的需要。所以，必須記取整風中的教訓，認清當前形勢，認識到必須進一步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二、發揚自覺革命的精神，不斷地開展兩條道路和兩種方法的鬥爭。客觀形勢，僅僅是促使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個條件，知識分子要真正改造思想，還必須具備自覺革命的精神，不斷地開展兩條路綫，兩種方法的鬥爭。毛澤東同志說：“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矛盾論”）即是說，客觀形勢改變了，還必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願意自我改造，才能收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功。在當前教育事業革命中，許多教師尚能為了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利益，積極地自覺地參加教學改革，如有的教師拿出自己未發表過的著作、講義，並指出過去自己是抄那一本書那一章那一節的，請黨的領導上和同學們幫助他批判；但是也有相當的一部分人，表現得很不自覺，他們仍然站在個人主義立場，不願認真作自我檢查，不願接觸到思想本質，希望這些人能夠記取整風運動的經驗，提高認識，提高覺悟，自覺地參加教學改革運動。

三、在黨的領導下，按照黨所指出的方向、道路來改造資產階級思想。黨為了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除了建立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以外，是十分重視改造舊知識分子的。黨制訂了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指出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的方向是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普通勞動者，向又紅又專道路前進。有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雖然表示擁護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但實際上對黨的政策、指示的精神並沒有真正的認識。他們牢牢地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用資產階級的观点來理解黨的政策指示，結果，不僅談不上按照黨所指出的方向走，相反是背道而馳向資產階級的方向走。如把業務實踐理解為“業務第一”，高唱所謂“生財有大道，成名有捷徑”，繼續走他們二三十年所走過來的白專道路，

而不以馬列主義思想來指導業務，以致不僅沒有通過業務使思想得到改造，而且越陷越深。有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他們學習馬列主義不是用來改造思想、指導業務，因此成了教條主義的背誦。不僅如此，有的甚至用馬克思主義來裝飾門面，在馬克思主義堂皇的名義下，販賣資產階級的私貨；有的則斷章取義，摘引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義，或作修正主義的解釋；有的則公開宣揚“文字學與馬克思列寧主義聯繫不起來”。然而從整風中暴露出來的情況證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離開了黨的領導，離開了黨所指出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道路，要得到真正的改造是不可能的。必須堅決按照黨的政策和指示，把自己改造成一個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四、在當前教育改革運動中，黨的領導、教師和群眾三結合，是在這一改革中實現黨的領導和走群眾路綫的最好形式。採取這種“三結合”的形式，教師的作用將得到真正的發揮，而教師本身的改造也將得到黨的領導和群眾更好的幫助。但是有些教師在群眾性的教育改革中，對“三結合”是有抵觸的，他們認為這是限制了教師的作用的發揮，這種思想說明了他們對黨的領導，群眾的幫助，沒有足夠的認識。應該歡迎群眾的幫助監督。一切輕視群眾的思想，其本身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如果不首先克服這種思想，還談什麼思想改造呢！

五、積極參加生產實踐和勞動鍛煉。事實證明，參加生產實踐與勞動鍛煉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的必經之路。在生產實踐和勞動鍛煉中，是最能夠徹底暴露資產階級各種思想以及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原來面目，檢查出真假科學，容易找出病根，對症下藥；同時，由於參加生產實踐和勞動鍛煉，就能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出象牙之塔，打開眼界，改變以往教育脫離政治，理論脫離實踐，教育脫離生產以及脫離群眾的狀態，從而根本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觀點和思想方法。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普通勞動者。因此，自覺地參加生產實踐和勞動，也是檢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否真正願意放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和學術思想的試金石。同時，也只有真正做到自覺地參加勞動，在勞動中政治掛帥，才能在勞動中獲得豐收。

#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 論“資產階級式的法權”

### 一 法權的起源和定義

我這番研究工作使我得出結論如下：法權關係，也如國家形式一樣，不可能從它們本身中得到理解，也不可能從所謂人的精神一般發展過程中得到理解；恰恰相反，它們是根源於物質生活關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成為真正的基础，而各該歷史時代的法權制度的、政治制度的，同樣，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觀念的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應當由這個基础來說明。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頁）

你們既是根據你們自己對於自由，教育，法權等等的資產階級見解來估計我們廢除資產階級財產所有權的主張，那末就請你們別和我們爭論吧。你們的觀念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底產物，正好象你們的法權不過是被提升為法律了的你們這個階級底意志，而這一意志底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底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頁）

### 二 勞動和分配問題

“勞動的解放要求把勞動資料提高為整個社會的財產，並要求在公平分配勞動所得下集體調節

全部勞動”。（這是在哥達代表大會上，拉薩爾派提出的機會主義綱領第一部分第三條，下面是馬克思對這一條文的批判的摘錄——編者）

……

什麼是“公平的分配”呢？

難道資產者不是斷定說，現代的分配是“公平的”嗎？並且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代生產方式基礎上的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係是由法權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不是由經濟關係產生出法權關係嗎？並且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不是抱有关于“公平的”分配的各種極為不同的觀念嗎？

為了要知道“公平的分配”一語在這種場合是指什麼東西，我們必須把第一條和本條對照一下。後者假定一個社會，里面“勞動資料是社會的財產並且全部勞動是由集體調節着”而在第一條里我們則看到，“勞動所得應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權利屬於社會一切成員”。

“屬於社會一切成員”？甚至也屬於不勞動者嗎？那末“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又何在呢？只是屬於社會中勞動的成員嗎？那末社會一切成員的“平等的權利”又何在呢？

但是“社會一切成員”和“平等的權利”顯然只是些空話。問題的實質在於：在這個共產主義社會里，每個勞動者都應當得到拉薩爾式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

如果我們把“勞動所得”這個說法首先當作勞動產品的意思來看，那末集體的勞動所得就是全部社會產品。

現在從它里面應該扣去：

第一，補償消費掉的生产資料所需要的費用。

第二，用以扩大生产的附加部分。

第三，为预防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而用来保险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作出这些扣除乃是一种经济上的必要，而扣除多少，应当按照现有的资料 and 力量来确定，部分应当按照或然论来确定，但无论如何不能根据公平原则来扣除。

剩下的是全部产品中的其他一部分，即作为消费品用的那一部分。

在把这个剩下的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从里面又得扣除：

第一，一般的不属于生产的管理费用。

这一部分和它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数额比较起来，将会立即大大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作为共同满足需要的费用，如学校、保健机关等费用。

这一部分和它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数额比较起来，将会立即大大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加强。

第三，如丧失劳动力者设立的基金等，简言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方救济的费用。

只有现在我们才谈得上纲领中說到的——在拉薩尔的影响下仅仅如此偏狭地說到的——那种“分配”，就是說，才谈得上在集体的个别生产者中間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品。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經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生产者私人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用来为他这个社会成员謀福利。

也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語已經消失了那样，一般“劳动所得”一語现在也在消失下去。

在一个根据集体主义原则組織起来而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消费在产品生产上面的劳动，在这里也同样很少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即很少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质特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劳动已不經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全社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一由于意义含糊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說法，便丧失了任何意义。

我們这里所說的不是已經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

义社会。所以，每一个别的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后，从社会中正好领回他所給与社会的一切。他所給与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股份。例如，社会的工作日就是一些个人工作小时的总和；每一个别生产者个人的工作時間就是社会的工作量由他所供給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的工作日里占有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領得一张收据，証明他供給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收据又从社会储备中領得与其劳动量相等的那么多的消费品。他以一种形态給与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态全部取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那个調节商品交换的原则，因为商品交换是同等价值的交换。内容和形式在这里都改变了，因为在变更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誰都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供給，另一方面，也因为除了个人的消费品之外，再沒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但是，說到消费品在各个生产者中間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着在商品等价物的交换里也通行的那个原则，即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可以与另一种形态的同量劳动交换。

所以，这里平等的权利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但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則只是平均地存在着，而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有一方面还仍然受资产阶级范围的限制。生产者们的权利是与他們供給的劳动成正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平等的尺度——劳动——来計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貢獻的劳动量較多，或者能够工作的時間較长；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应当按照時間长度和劳动力强度来确定，不然劳动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个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是个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的差別，因为每个人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只不过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認不同等的个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种天然特权。所以根据其內容来講，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根据它的性質来講，只有在使用平等的尺度时才能存在；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只有在下述场合才能用同一的尺度去計量，即以同一的观点来看待他們，从一个确定的方面去对待他們，譬如就象在上述场合一样，把他們只当做工人看，在他

們身上再也看不出別的什麼，撇開其他一切東西不說。其次，一個工人已經結婚了，另外一個則沒有；一個工人的兒女較多，另一個工人的兒女較少等等。在同等的勞動下，亦即在同等享受社會消費品存額的條件下，某一個人在實際上所領得的比另一個人多些，某一個人就會比另一個人富些等等。為要避免這一切，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但是這些缺點，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中，在它經過長久的產育苦痛以後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里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權永不能超過社會經濟制度以及由此經濟制度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程度。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當那奴役的人們、迫使其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後；當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隨之消失後；當勞動已經不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為樂生的第一要素時；當生產力已隨着每個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泉源都盡量涌現出來時，——只有那時，才可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的狹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消費品的任何一種分配，始終只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後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於：以資本私有制和土地私有制為其形式的物質生產條件，掌握在不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也就要自然而然產生出現代的消費品分配。如果物質的生產條件將是工人自己的集體財產，那麼結果也就要產生出跟現代不同的消費品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而由於它，某部分民主主義亦然）從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那兒學了一套手法，即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生產方式的東西，而由此把問題描述成這樣：仿佛社會主義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打圈子。但是真正的關係既然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麼又要開倒車呢？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19—23頁，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

馬克思說：這裡確實有“平等權利”，但這還是“資產階級的法權”，它同任何法權一樣，是以

不平等為前提的。任何權利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在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權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確，每個人付出同別人相等的一分社會勞動，就能領取一分相等的社會產品（除了上述扣除的以外）。（這裡指“上述扣除”是指後備基金，擴大再生產基金，機器折舊，管理經費和學校、醫院、养老院等福利基金——編者注）。然而每個人是不同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結了婚，有的沒有結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

馬克思總結說，……“因此，在同樣的勞動下，在平等地享受社會消費品的條件下，某一個人在實際上比另一個人領得多一些，這個人就會比另一個人富裕一些等等。為要避免這一切，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還會不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了，因為那時已經不能把工廠、機器、土地等生產資料攫為己有了。馬克思駁倒了拉薩爾關於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資產階級說法，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說明這個社會最初只能消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却不能立即消滅“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馬克思不僅極其準確地估計到人們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還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仍然占着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法權”的不平等，因為產品是“按工作”分配的。

馬克思繼續說道，……“但是這些缺點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經過長久的陣痛以後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過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決定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法權”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發生的經濟變革範圍內，也就是在對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取消。“資產階級的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只有在這一個範圍內，也只能在這個範圍內，“資產階級的法權”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會各

个成員間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調节者(决定者)。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則已經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領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則也已經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不同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領取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的法权”。

馬克思說,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們立即就会不需要任何法规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創造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外,沒有其他法规。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資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分配的平等。

馬克思接着又說: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迫使人們奴隶般地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經消失,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財富的資源都会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現在我們才認識到,恩格斯无情地譏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詞連在一起的荒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时,也就是說,在人們已經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他們的劳动生产率已經大大提高,因此他們能够自願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这种使人象夏洛克(夏洛克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典型的高利貸者——編者引注)那样冷酷地斤斤計較,不愿比別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別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观点就会打破。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領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領取。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經濟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

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們遵守法规的机关,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內,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的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沒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其实,無論在自然界或社会实际生活中,我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的情形。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资产阶级的”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刚从资本主义腹內脫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2—458頁)

关于复杂劳动的較高工資之全部重要問題,怎样解决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教养熟練劳动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来負担的;所以熟練劳动力的較高工資,也首先是归于私人:熟練的奴隶,卖得貴些,熟練的工人也得到較高的工資。在社会主义地組織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費用,由社会来尝付,所以复杂劳动所創造的成果,即更多的价值,也归于社会。工人自身,不能要求任何額外报酬,从这上面,更得出这样的实际的結論:工人对于“全部劳动产品”的得意的要求,又一次显出是有缺陷的。

(恩格斯著“反杜林論”,1878年,1957年版,第208頁)

……从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所有一切公务人員,都只应領得等于工人工資的薪水,上等国家官吏所享有的特权及办公費,都随着这些官吏本身之消除而消除了……

(馬克思:“法蘭西內战”,轉摘“国家与革命”,解放社1949年版,第41頁)

所謂共产主义,严格說来就是无代价地为社会工作,不考虑每个人的差別,絲毫沒有旧的观点,

沒有守旧心理、旧习气、各工作部門間的差別以及劳动报酬上的不同等等。……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會議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19年12月2日，載“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161頁）**

共产主义劳动一語，若是比較狭义地，严格地說来，乃是有利于社会的无偿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获得領取某种物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标准額，而是自愿的劳动，超过定額的劳动，不打算領到报偿的劳动，沒有报偿条件的劳动，而是为了公共利益按习惯来操作的劳动，而是按必須为公共利益操作的这种自觉态度（已成为习惯）来劳动的劳动，——是健壮身体所自然需要的劳动。

**（列宁：“从破坏历来旧制度到創造新制度”，1920年4月8日，載“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87頁）**

我們將致力于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咀咒的原則，消灭認為劳动只是負担和只有按一定定額付酬才算合理的劳动的习惯。我們將努力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則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灌輸到人們的意識中去，使它成为群众的生活习惯，以便逐漸不断地把共产主义的紀律推行到共产主义劳动中去。

**（列宁：“从第一个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的星期六义务劳动”，1920年5月2日，載“列宁論劳动”，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第482頁）**

社会主义是直接 from 資本主义里面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級形式。至于共产主义，它是这种社会的高級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不要資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組織的先锋队即先进部队施行最严格的統計、監督

和检查的情况下共同劳动；同时还應該规定劳动量 and 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資本主义社会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遗迹和习惯，如劳动的单独进行，对公共經濟的不信任以及小业主的旧习惯等，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占統治地位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經濟的要求背道而馳的。我們所謂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們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大家工作已成了普遍的现象。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2—253頁）**

### 三 自由、平等問題

劳动的买卖，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内进行的。这个領域，实际是天赋人权之真正的乐园。在那里行使支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Bentham）。

自由！因为一种商品（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是由他們的自由意志决定。他們是以自由人，权利平等者的資格，訂結契約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第176頁）**

资产階級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馬克思以来称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級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縛不能并容的；资产階級破坏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资产階級的社会制度、自由竞争的王国、来往的自由、商品所有者的平权，一句話，一切资产階級的妙事。

**（恩格斯著：“反杜林論”1957年版第280頁）**

“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句用以代替“消灭一切階級差別”的話，也是很成問題的。在各个国家、省份甚至各个地方之間，在生活条件方面总是要存在某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来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



尔卑斯山居民与平原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有所不同。把社会主义社会当作平等乐园的观点是个与“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有联系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个观点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会是正当的，但是现在这个观念则象以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应当克服下去，因为它只能引起混乱，并且因为现在已经有了阐述这个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弗·恩格斯致奥尔·倍倍尔的信  
1875年3月18—28日，伦敦。馬  
克思恩格斯文选二卷集第二卷，  
第41—42頁，1955年莫斯科中文  
版）

我們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是目前只是开始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們决不能给自己提出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時間內仍要給专家们以較高的报酬，使他們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績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組織工作的獎金制度；在完全的共产制度下獎金是不需要的，但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代，如理論和苏維埃政权一年来的經驗所証实的，沒有獎金是不行的。

（列宁：“俄共布党綱草案”，1919年  
2月“列宁全集”，第29卷，人  
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0—91  
頁）

恩格斯說得万分正确：平等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謬的偏見。……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話。我們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說，我們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說我們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謂的空談和知識分子的愚蠢的捏造，……

所以我們說：我們要爭取的平等是消灭阶级。因而也要消灭工农之間的阶级差別。这正是我們的目的。……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騙  
人民”，1919年5月19日“列宁全  
集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321—322頁）

……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說：（甲）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产資料轉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平等地废除生产資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丁）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馬克思主义认为，無論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質量上或在数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

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  
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总  
結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  
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4頁）

从民主主义观点看来，各资产阶级宪法可分两类：第一类宪法直接否認公民平权和民主自由，或在事实上把公民平权和民主自由化为烏有。另一类宪法乐意接受，甚至标榜民主主义原則，但同时又加上許多附带条件与限制，而把民主权利与自由损伤无余。他們說一切公民都有平等选举权，但同时又用居住年限、教育程度以至于财产資格来加以限制。他們說公民有平等权利，但同时又加上附带条件，把女子或一部分女子除外。还有其他諸如此类等等。

（斯大林“論苏联宪法草案”。见“列  
宁主义問題”，莫斯科1949年中  
文版，第682頁）

……一待劳动平等和工資平等以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立刻发生从表面上的平等进到实际平等，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原則問題。至于人类究竟会經過怎样的阶段，究竟用怎样的实际方法达到这个最高的目的——这是我們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文  
选”两卷集，莫斯科1950年中文  
版，第2卷第247頁）

## 附录：苏联大百科全书解释 “资产阶级法权”

历史上第三种剥削者的法权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法权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推翻封建社会制度而产生和形成起来的。它表现着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为了形成、巩固和保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本主义是比封建主义更为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这反映在资本主义发展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和服务性作用中。在这一发展阶段，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捍卫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因此，资产阶级法权表现着比较民主的原则。例如，它消灭了等级制度、农奴制的和其他形式的封建依附关系，宣布了一切人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公民自由（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迁居自由、结社自由），人身、住宅和私人通信的不可侵犯，确定了依法权审判和处理行政事务的原则。资产阶级法权之所以有相对的民主，是因为垄断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要求采取新的形式来剥削劳动人民。资本家宁愿同摆脱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工人打交道，因为工人有相当程度的文化知识，能够正确使用机器。因此资产阶级法权的特点是采取超经济的强制方法。它在形式上宣布人身自由和一切人在法律上平等，同时又保持着经济上的

不平等，因而也保持着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因此资产阶级法权的民主是残缺不全和简陋的。资产阶级法权就其性质来说是民族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因为在所有资产阶级国家里，都存在着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民族和种族不平等是合理的，民族和种族歧视是合法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通常总是存在着男女的不平等。

在帝国主义时代，政治普遍由民主转向反动。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即在世界由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和平民主阵营的加强而分裂成两个对立体系之后。民主自由的消灭过程在法西斯制度国家中宣告完成。在193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中欧、东南欧及亚洲许多国家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并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某些资产阶级国家便竭力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民主制度。塔虎脱——哈特莱法令、麦克伦——伍德法令以及其他法令，对共产党人的审讯，联邦调查局和所谓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活动的加强等等——所有这些事实证明美国宪法中宣布的公民自由遭到破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资产阶级法权是为了资产阶级利益而反对革命地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力量之一。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文献有：1900年的德国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931年的意大利刑法典等等。

（“苏联大百科全书”：“法权”和  
“资产阶级法权”条）

## 更 正

本刊1958年12期第十三页右栏，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五字“质”误作“资”。第十四页左栏第十一

行“并且认”之后漏了一个“为”字。特此更正，并向读者和作者致歉。

## 稿 約

(一) 本刊欢迎投稿。

(二) 本刊特別欢迎下述性质的稿件：

1. 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社会科学原理闡述我国当前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的重要問題；特別欢迎闡明毛澤东同志著作的研究論文、讀書筆記、学习心得等稿件。
2. 批判資產階級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理論等方面的研究論文。
3. 通俗闡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基本問題的著作。
4. 华南地区的科学研究資料和学术性調查材料。
5.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評介。

(三) 本刊文字以語体文为主，要求尽量精簡，一般不超过六千字。来稿請用稿紙謄写清楚，并示詳細地址。不拟采用的稿件，負責退还。

(四) 来稿发表后，即奉稿酬。

(五) 来稿請寄：广州市越秀北路 222 号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內“理論与实践”編輯部。

# 理論戰綫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性刊物(月刊)

每月10日出版 每期定价2角

“理論戰綫”是1958年1月在武汉創办的学术性刊物。它的任务是結合实际宣传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毛主席的著作，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探討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論，开展学术問題上的自由討論，批判資產階級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宣传革命的唯物主义，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树立批判的、革命的、联系实际的理論方向，批判唯心主义的、脫离实际的理論方向。

它的特点是強調现实性、战斗性和群众性。讀者对象是学术理論工作者、大中学校的教师、高等学校的学生、工作干部。同时辟有通俗專欄，供城乡基层干部和工农群众閱讀。

---

# 理論与实践

月 刊

1959年第1期(总第13期)

編輯者：理論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中国科学院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9年1月15日出版

印刷者：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

本刊代号：46-71

刊号：(穗)0368

印张：3张

定价：每册二角